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3月15日第5期 总第21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5期

目录

【专稿】

启之 什么是“红色文化”？

【重评经典】

章陀 《雷锋》：政治图腾与积德行善

【子夜谭】

何與懷 消灭私有制！“高级黑”抑或“高级红”？

向南雷 “红色教育”的背后——读罗治《浅谈师大女附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调查报告】

乔晞华 关于文革中民众参加群众组织调查的初步报告

【述往】

刘沂伦 困惑的革命年代

顾媛 被热情分裂，被浩劫警醒——我在女附中的心路历程

晏乐斌 我所经历的“三查”和“土改”

【无达诂】

烏黎拉 调寄山坡羊：为主流文人画像

【文摘】

马昌海 文革前“老三届”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封面】

邹行 波普雷锋

【读者来信】

1. 乔晞华谈王复兴之文 2. 余汝信纠小鹰文中的张霖之之误

【本刊声明】

【专稿】

什么是红色文化？

启之

近年来，红色文化大行其道，并且派生出红色精神、红色基因、红色历史、红色教育、红色文艺、红色经典、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红色旅游、红色景点、红色征程、红色短信，以及“红色朗读者”、红色收藏家等等众多新词。

那么，什么是红色文化？

红色专家的定义是：红色文化是中共“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指向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文明总和。”¹

既然如此，这红色文化为什么会造就了反右、大跃进、三年饥馑、十年浩劫？为什么会饿死数千万人，吃掉数百万红色儿女，制造无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还要掩盖真相，推卸责任，把十年浩劫改成艰辛探索？

邓小平承认，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中的那些主义如何界定？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毛泽东继承更多的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人们常说，社会主义至少有民主和暴力的两种，红色专家说的是哪一种？

那么，是否可以说，红色文化就是革命的绞肉机？专制主义的集大成？厚黑之渊藪，游民之老巢，暴之极？痞之最？恶之花？总之，是党文化的另一种说法呢？

NO！如果红色文化等同于党文化，那么它为什么能造就成千上万为国为民的英雄豪杰，为什么造就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等政治精英？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它能立国建政，改

¹ 这个定义的全部内容：“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从文化的边界范围来看，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人类进步文明的总和。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指向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文明总和。”（王二路：《漫谈红色文化》）

革开放？为什么会被亿万民众所热爱，为无数志士仁人所追随？且延续至今，不见尽头？

答案只有一个，红色文化是一个含混、复杂的概念，它既不是单纯的党文化，也不是毛泽东所宣称的新文化。¹它包含“党文化”，也包含普世文化。

“党文化”是以维护本政治集团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与普世价值对立的政经体制、思想体系和政策方针的集合体。它包括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兴无灭资、权术厚黑、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等等。在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这种文化统治了一切思想文化领域，在教育、文艺、传媒等方面更为明显。

然而，“党文化”并非自居独处，而是与普世价值——人道人性、公正无私、舍己为人、勇于牺牲等人类共同尊奉的道德，和坚强、进取、勤奋、诚实、守信等人类共同推崇的品质同居杂糅，混为一体而难分难解。《白毛女》歌颂坚贞爱情，也极尽歌德之能事。

《烈火中永生》以革命者之坚强不屈，高歌乌托邦理想。《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反压迫、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为农工弱势群体说话的同时，也充斥着个人崇拜和一党迷信。《雷锋》表彰了好人好事，也宣扬了愚忠思想。《创业》、《金光大道》、《闪闪的红星》在弘扬英雄主义的同时，也灌输了激进主义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如同旧戏中的封建文化一样，“党文化”深深地植入“红色文艺”的肌体之中。

李泽厚“告别革命”，却没有告别其中的普世价值。他认为：“不要革命，并非不尊重过去革命所高扬、所提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道德品质、崇高人格。它们仍然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太上立德’，这些英雄们在这个方面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情感语言和典范人品。……人们可以从过去的革命情怀中吸取力量，用在更有实效更少毁伤的生活和人生道路上。因此，尽管十月革命已经泯灭，尽管那美好的理想早已落空，尽管那革命近乎无谓，那些流血牺牲似乎并不值得……你可以去责难那些设计者、领导人、空想家，但是那奋斗，那流血，那牺牲本身（也包括那些领导人本身的艰苦奋斗、

¹ 毛泽东宣称，“五四”以后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才能领导“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资产阶级思想至多只能充当一个盟员；共产主义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继承者，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10]《毛选》三卷，第832页。

流血牺牲），不仍然给后代人们树立了值得学习、仰慕和尊敬的光辉的道德榜样、人格力量和崇高形象吗？怎么能去非议去诋毁它们本身呢？”¹

钱理群在痛斥“党文化”的同时，高度赞扬红色文化中的积极一面：在苏美联合封锁时激发出的民族精神——“鲁迅式硬骨头精神，和韧性精神。以及六十年代中国工人创造的‘大庆精神’，农民创造的‘大寨精神’，知识分子创造的‘导弹精神’。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尽管这种精神，曾经被意识形态化，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但构成其核心价值的‘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民族独立自主精神，依然可以作为东方风格，并成为今天重要的思想资源。”²

国共两党的党文化多有相似处。但是，它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中共的政治纲领——马列主义毛思想。这是中西方支流文化（共产主义、皇权专制、游民文化等）的混合，而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则是中西方的主流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联手。正是这个不同，使台湾能够在经济转型不久，放弃一党专制，归依世界主流。

研究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有几点要注意，第一，要防止人们用“文明总和”来掩饰红色文化中的党派性。第二，不要因为红色文化中包含中许多消极因素而无视其中的普世性。或将其简单地拒斥门外，或试图把它一棒子打死。事实上，它既挡不住，也打不死的。第三，“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一直把消极因素当作积极因素来坚持和强化。”³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反省红色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清理其中的党文化。也就是如本刊211期所说的文化清理与文化重建——“清理是为了立足，有了立足点才能谈上文化重建。重建的基础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厉害了我的国’。重建的标准是普世价值，而不是‘党文化’。重建的成果来自于自由心灵的创造，而不是来自于‘国家订货，组织生产’。重建的目的是彻底荡涤文革的遗毒，而不是重振毛体制，复兴‘红色文化’。”■

2018-2-16 春节

¹ 李泽厚：《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页328-329，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

²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下，页341，台北，联经，2013。

³ 《何方自述》页780--781。

【重评经典】

《雷锋》：政治图腾与积德行善

章 陀

1964年，在举国学雷锋的热潮中，八一厂奉天承运，推出电影《雷锋》，第一次（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¹）将色彩斑斓的雷锋的故事投射到银幕上——一方面，影片通过雷锋向学生讲述身世，表达了这个自小失去双亲的孤儿对党，对新社会的感恩和热爱，对地主、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通过买毛选，学毛著。宣讲毛的教导等情节，表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对毛的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另一方面，影片又用了更多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雷锋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带病到工地义务劳动；冒着大雨，送不相识的老太太回家；拿出自己车上的备胎，为半路抛锚的司机乘客排忧解难；舍不得买一瓶一毛钱的汽水，穿着补了又补的袜子，却将省下的大笔津贴捐给灾区人民，寄给战友生病的母亲……。

这个影片中至少包含着两种东西，一种是政党的，颂圣忠君、阶级立场、忠于革命、共产主义理想；另一种是普世的，助人为乐、勤俭节约、敬业爱岗。这两种东西交溶杂揉，将最高尚的品质与最愚昧的理念集于一人，铸就了既让人敬仰又令人憎恶的“雷锋精神”。

这里讲的全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没有战场上的英勇杀敌，没有革命征途中的艰难困苦，没有敌人的酷刑和刑场上的壮烈。就连牺牲也是那么平淡无奇——在被一个电线杆砸倒之后，雷锋一直昏迷不醒，连一句交党费的话也没有留下就撒手尘寰。致使主创不得不放弃了仰拍的松柏和拍岸的海浪，而只能用一组张贴画般的蒙太奇——雷锋的战友王大力的面部特写，飞驰的火车，雷锋班的锦旗，持抢握拳的宣誓，捧读毛著的人海。再配以《学习雷锋好榜样》的主题歌，最后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题辞来结束全片。

宣传英模人物，是毛时代电影的重要职能之一，雷锋这个形象继往开来，在歌功颂德和好人好事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个新的文化范式，他把忠君爱党落实到学毛著，写日记上；

¹ 关于雷锋的电影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摄于《雷锋》1964年的（八一），第二部是摄于1979年的《雷锋之歌》（八一），第三部是1996年推出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出品）。

把共产主义精神化为一件件人人可为的积德行善。这一范式扎根生活，简单易行，使“雷锋精神”具有了其他英模所没有的“广谱性”。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部《雷锋》，政治家看见忠，宣传家看见公，艺术家看见情，知识分子看见道德理想，青年学生看见人生楷模，政治辅导员看到的则是“革命日记”。

“雷锋精神”是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形象代言，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大力鼓吹下，学毛著从实变虚，写日记由真而假。后毛时代批评当年把学毛著形式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与《雷锋》有很大关系。而随着“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雷锋》也把“歌德与效忠”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十年浩劫”做了精神铺垫。

后毛时代追索文革原因，批判雷锋身上的愚忠，指出他是中共宣传个人崇拜的“政治图腾”。这种思想清理启人心智，意义重大。但是清理者往往看不到“雷锋精神”中的普世价值，而仅仅把“雷锋精神”定位为“一个陈旧僵化、愚昧无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¹

这部影片告诉人们，雷锋把学毛著真正落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更打动人心的是，雷锋的服务对象，没有出身成分之差，没有地位等级之别——他不曾想过，雨中迷路的老大娘是什么成分；也不曾想过，半路抛锚的司机是什么出身；到工地义务劳动，他只是“低头推车，没有抬头看路”，而从来没有想过，砖供应不上，是不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更没有留心，工地领导走的是何种路线？²

雷锋奉行的与其说是有着明确政治内涵的“为人民服务”，不如说是儒家的“仁者爱人”和民间崇尚的侠肝义胆。后毛时代整天挂在嘴边的“大爱无疆”，被雷锋提前三十年，以毫不煽情的质朴落实在脚下。如果说，在知识分子那里，雷锋是高尚道德、完美人格与高远理想的结合；那么，在普罗大众那里，雷锋则是扶危济困的好汉，厚德博爱的天使。

¹ 康华：《解读“雷锋精神”》，《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二期。

² 1979年八一厂出品的电影《雷锋之歌》，弥补上了这一缺陷，把这种时代精神强加到雷锋身上。

生活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中，被自造的危机感弄得神经兮兮的人们，谁不希望看到一张无邪的笑脸，听到一声善意的问候？谁不希望在碰到困难时，不问出身，不查历史，就可以遇到一片爱心？伸来一只援手？

愤怒的批判者认为，“除了效忠党以外，雷锋的“事迹”其实完全是一大堆平凡无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琐碎小事。”¹殊不知，正是这些琐碎小事的践行，使“雷锋精神”从权力的庙堂走向百姓生活，从政治的宣教走向街头巷尾，枯燥冰冷的政治圈腾由此变成了温暖人心的举手投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雷锋会成为“常青树”而“历久如新，弥老弥坚”？为什么“‘活雷锋’这个名词的生命力如此之旺盛，不仅是在官方媒体上，而且也在平民百姓的日常话语中。”²

指责雷锋愚忠不难，难的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雷锋的政治生命和社会影响居然会在毛、林身后超过毛、林本人。”用愚民政治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³事实上，能够赋予“雷锋精神”强大生命力的，只有普世价值。正是普世性使雷锋精神有了创造性转换的可能。后毛时代告别阶级斗争，在“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高扬“雷锋精神”中的懿言善行，使之上与仁者爱人的传统相通，下与“小红帽”这种新型的公益组织相连。⁴同时又强调雷锋的爱岗敬业和勤奋好学。⁵在青年一代眼里，“雷锋精神”成了献身公益，热心慈善和励志进取的代名词。后毛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则不约而同地消弱“雷锋精神”中党性，将其定位于新型的“为人民服务”，⁶“雷锋精神”从此完成了角色的转换。■

¹ 康华：《解读“雷锋精神”》，《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二期。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小红帽”是社区中无私助人的公益组织。见1996年出品的《离开雷锋的日子》。

⁵ 在百度上，“雷锋精神”被归结为两个字：“上”与“善”。所谓向上，就是在工作上发扬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学习上发扬刻苦钻研的“钉子”精神。生活上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所谓向善，则是1、在理想信念上“向善”，发扬“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向善”，发扬“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3、在人际关系上“向善”，发扬助人为乐的合作精神。

⁶ 这一点从国家领导人的题辞中，即可看出。后毛时代，国家领导人不约而同，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了雷锋精神的主要内容：“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叶剑英）；“全国人民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杨尚昆）；“学雷锋精神，做人民公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乔石）；“发扬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姚依林）。

【子夜谭】

消灭私有制！“高级黑”抑或“高级红”？

何與懷

一百七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这两位年轻人，一个二十九岁，一个二十七岁，怀着对资本主义种种罪恶的极其痛恨，以烈火一般的激情，写下这部天下第一奇书。他们要怎样消灭他们认为万恶之源的私有制呢？他们鼓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用仇恨向世界宣战，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煽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天堂。后来，在他们晚年，他们发现自己错了，做了许多修正。但是，非常不幸，在他们之后，许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却无视他们的修正，继续强暴、消灭私有制这个号称“人类历史上最壮丽事业”。

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真可谓心硬如铁，坚定无比，前赴后继，让千万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让国家民族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只是……只是迄今并未看到成功的影子。不过，革命自有后来人。今天，在中国，又跳出一个人了。他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斩钉截铁般按《共产党宣言》一样宣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文章以最强音发出警告：“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这个人不是玩枪弄炮的武士，而是耄耋之年的学者，他大名周新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最主要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代表一个潮流，一个强大的力量。他的文章先是在中国左派微信公号《察网》刊出，其后在1月15日被中共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

栏目官方微博迅速予以转载。该知道，《求是》可不是一般的媒体，它在中共官员中的影响，与党媒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社旗鼓相当，是“政治正确性”的代表。这自然使海内外严重疑惑：周文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它要求消灭私有制的观点，究竟是代表谁的立场？

眼下，此文已引出几十万条评论留言（仅数日该文在新浪网的评论已多达六万多条），已引出官方民间激辩，引出中国左右又一次对阵，真是2018新年开张大吉，好不热闹。

有网民嘲讽周新城们讲一套做一套，“先把你全家财产拿出来充公，再批评私有制”。当然，这是很“低级”的嘲讽，周某是不屑一顾的。

许多人引经据典，从人性说起，或用历史事实，或以理论高度，对周文批驳之。

按《共产党宣言》，剥削的根源在私有制，因此用革命的方式打破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能免于剥削。然而，残酷的事实是，私有制被革命后，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出现了财产在名义上（抽象的）归于国有（公有），但实际支配者却是具体的掌权者（官僚）。当这些无主财产被国家掌控后，广大民众则丧失了一切财产，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于这个体制。私有制被否定后，不单财产而且人身自由及一切权利都变得更容易管控，这就为新的奴役和压迫大开了方便之门。掌权者像所有人一样具有自私性和自利性，他们会利用名义上的公有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新的剥削和奴役就会出现，而这种剥削和奴役是建立在全方位的控制与垄断之上的。至此，打着反压迫的名义压迫，打着反剥削的名义剥削，便开始大行其道！

红色高棉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年，波尔布特这个疯狂魔王，在消灭私有制的路上走得最远，因而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称“波尔布特一举消灭了阶级”，“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结果，短短三年八个月间，柬埔寨死于杀戮、饥饿、疾病的人数约两百万，其中直接死于杀害的约一百万。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非常恐怖的数字——当时柬埔寨全国人口还不到八百万啊！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可怕的实验，在运动早期便有许多先知先觉的人有所觉察。连中国新月派现代诗人徐志摩也是其中一个。他在1925年取道苏联去欧洲，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了三天后，发了一通感慨，就把其本质讲透了。他

用诗人的语言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上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片血海。

那些狂热的革命领袖以及他们的死忠追随者其实未必不明白这一道理，或许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已经完全清楚这个必然结果，但为了自己的某种追求或既得利益，就把谎言鬼话装成真理，并以蒙骗、引诱、强迫、掠夺、杀害种种手段，让民众为消灭私有制、迈向“共产主义天堂”而献身。过去许多年，是有人中魔上当，不过，现在，那些把戏好像越来越不灵了，信的人已经很少了。

那么，把周文看作一篇心智异常不知今夕何夕的梦呓奇文吧，奇文共赏，或可一笑置之。

但是，且慢，忧心忡忡的人说，周文绝不可一笑置之。此文今天突然高调批判私有制，显然颇带向党中央最高权力机构进行政策建议的意味。文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对待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巧合的是，公然公开宣示“消灭私有制”是文革结束后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的；而周文刊发前几日，媒体曝出中国官方新版历史教科书对文革历史进行了大幅修改甚至美化，竟然也不顾1981年中共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了，两件事情是否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呢？也许，周新城泄露了天机？他说的才是大实话。道理很简单，不共产，何以叫共产党？！什么市场经济，什么产权保护，这一切不过因时间未到而已。时间到了会如何，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延安时代不是信誓旦旦说不走苏联路么？后来又如何？因此，周文实在是画龙点睛之杰作，被党的主力喉舌鼓噪，说明党要撕下以往的所有稀泥与伪装了。

那么，问题来了。正如有人金睛火眼，发现周文狠批为私有制辩护的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称张为“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称吴“人格卑劣”“用心极其险恶”，而这，不过是指桑骂槐而已！

回顾当年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时候，邓小平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十多年后，当人们从这场流光溢彩的财富梦中相继醒来时方才明白，邓许诺的是谁有权谁先富，而且是让他们利用权力通过掠夺和盗窃民众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暴富起来。2006年4月开始在网上流传的那份调查统计揭露，中国的亿万富豪，90%以上是高干子女。或据2012年6月19日北京《人民政协报》官方的报道，中国0.4%的人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权势和钱势都如日中天的既得利益特权阶级。例如，中国前后首富马云的阿里巴巴和王健林的万达等等商业王国，其背后不就有一帮中共几代中央高官家族子弟吗？

这样，周新城的大文，或者更精确地说，指使在党的喉舌刊登周文的幕后者，是不是项庄舞剑？究竟剑指何方，不是若隐若现吗？

意思好像是，不是说不忘初心吗？你要左，我就左到底给你看，看你受不受得了——包括现任和前任几代的中央高官都会中枪的。这是否用心极其险恶？只是这个高调喊出“消灭私有制”的最绝“高级黑”，如何黑下去？那些马云、王健林们的“私有”，要不要真的拿出来“消灭”？是不是若然不这样，你就不是真共产党？！

或者，这招一点都不“黑”。这是“高级红”！其真意是为“党”这个利益集团洗地，而且一劳永逸——正所谓扫黑除恶，斩草除根。消灭“私有”后就成了“公有”“国有”，而所谓“公有”“国有”其实就是“党有”，由党控制，由党分配，“姓党”——姓“共产”的党，不就更名正言顺牢牢掌管全国全部的而且是红色的钱袋子了吗？不要以为，消灭私有制就是愚蠢地回到以前计划经济的死路。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新型的奇迹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是要向全世界显耀的模式。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洗礼，今天的中国，的确让世界刮目相看！■

2018年1月20日

【子夜谭】

“红色教育”的背后

——读罗治《浅谈师大女附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向南雷

在师大女附中自印的三大本“岁月丛书”中，《教育叙事》一书对研究十七年中学的红色教育最有帮助。而罗治的《浅谈师大女附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则是研究红色教育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文献。此文既有大量实例，又有理论分析，加上作者的现身说法，更富有说服力。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学生思想改造的微观历史。本文只是罗治这篇文章的缩写版，旨在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和罗治这篇文章。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

教育部门从一开始就没弄清楚

作者告诉我们，1957年是思政教育的转折点，之前的重点是爱国主义，之后的重点是阶级斗争。从那时起到文革，政治的势力越来越大，思想的空间越来越小，家庭出身越来越成为决定个人前途的要素。十七年的后半期，兴无灭资成为中学思想教育的指南。

最早的兴无灭资来自1954年1月全国中学教育会议，在这个会上，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钱俊瑞做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任务是在学校中，努力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着重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并继续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残余。”（《教育叙事》页137）。钱俊瑞当时没告诉人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后来他升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办主任，直到文革中被抓进监狱，也没把这两个概念说清楚。事实上，他也说不清楚。非但他，所有的施教者都说不清楚。因为授命他们的中共中央就稀里糊涂。文革后，邓小平承

认，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没弄清楚。

没弄清楚就加强，就批判，其结果就只能是越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那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皇权的、游民的、小生产者的、帮派的思想就越多越强大。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那些普世的思想理念就越稀薄。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这样的“雾霾”之中进行的。女附中人所受的苦，皆源于此。

二、时事政策教育：在国际方面，灌输错误理念，掩盖真实情况；在国内方面，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把学生愚昧化

1957年以后的九年中，女附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围绕着时事政策、革命传统和革命人生观这“老三样”开展的。这里先说时政教育。

顾名思义，时政教育就是讲解国外形势，国内大事。教育的方式，除了政治课之外，还有共青团、少先队或班集体组织的时事报告。报告者或本校，或外请。学生们被告之，为什么苏联变修了，什么是“三和一少”，为什么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如何看待战争，为什么要反右，要搞三面红旗、阶级斗争、四清。为什么之后，是宣讲各种运动的辉煌成果。讲解灌输的同时，还有各种活动：国庆游行练队，上街游行反对美帝侵略黎巴嫩，纪念十月革命节，学习“九评”等等。

从中学生在文革中的盲从和狂热中，可以知道，这些教育起了大作用，国际方面，它把错误的观念灌输给学生。比如，所谓苏联变修，完全是中共上层的极左判断。这一判断一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二是源于对国际形势的误判。马克思主义主张发展生产力，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毛为首的中共高层无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接受的主要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阶段，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搞“三和一少”，正是适应这一国际形势。而中共逆流而动，仍旧坚持用“战争与革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形势，在准备打仗的心态下，四处出击。直至把

自己弄成了国际孤儿。

国内方面，它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对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中共反右前叫人家提意见，其实是搞阴谋，“放长线钓大鱼”。所谓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说法不真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让学生炼钢，误了上课，得不偿失。农民生活很苦，与报上宣传的不符等等来自于经验的的正确认识。（页 148）校方一概按官方口径纠正批判之。

女附中 1960--61 年的工作总结，欣喜地告诉人们：“通过教育学习，学生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普遍得到提高。对国际形势开始会用阶级分析观点、辩证观点看问题。初三以上 90% 的学生都能分析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可能发生，社会主义强大，战争有可能制止。能从帝国主义的发展阶级本质分析战争的根源了。绝大部分学生懂得了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道理，对于战争的态度应该是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明确了武器不是人类命运的决定因素。人是起决定作用的。对于国内形势，不仅要从经济看，还要从政治上看，尤其要看六亿人民对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的态度和克服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学们了解到片面强调困难或只注意产量是见物不见人的资产阶级观点。……如高三（1）XXX（革命干部子弟）说，原来我认为有困难就不能说形势大好，这是因为我思想上缺少了‘人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这样一个观点。要看经济形势，更要看政治形势，看人民群众的干劲。要看问题，但必须看到成就看到前途，这样就不会感到形势不好。不少同学通过学习，能用阶级分析观点，辩证观点去分析形势问题，学生们听到的谣言或错误言论时能知道这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页 144）

这个总结告诉我们，女附中在把学生愚昧化——学校为学生们排忧解难的阶级分析和辩证法：什么“人起决定作用”，什么“从政治上看”，什么“革命乐观主义”等等，说到底都是诡辩和掩盖。文革中盛行的“人的因素第一”“精神原子弹”“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极左的思想观点，皆本于此。

三、革命传统教育：忆苦思甜成了为党，为领袖歌德效忠的工具

革命传统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世代相传的优良革命传统。”按照现在的说法，革命传统包括两方面，一革命前辈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和“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崇高品德”。二是中共的三大法宝，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以及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民主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革命传统教育就是这两方面的具体化。

作为中学教育的翘楚，六十年代的女附中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方面不遗余力。不过，校方把学习重点放到了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上，绕开了以“三大法宝”为中心的优良作风。不管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选，反正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在大跃进、放卫星、三年人祸之后，再给学生们谈中共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和谦虚谨慎，要么是没心没肺，要么是黑色幽默。

从现有的纪录上看，女附中最有成绩的是“三老四史”教育。“三老即老工人、老农民、老革命干部。四史即家史、村史、厂史、社史。”长辛店老工人、翻身农奴、老红军、售货员、炊事员、司机被请上女附中的讲台，痛诉家史，对比今昔。“组织报告共约二百余次”，初一年级还访问了龙须沟的老居民，访问后，各班座谈收获，写作文。此外，“每学期两周下乡劳动，通过访贫问苦以及在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贫下中农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深厚的阶级感情，也认识到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丑恶面貌。……在贫下中农的指引下，‘识别’地主富农（基本属于后代），增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通过忆苦思甜会激发阶级仇恨，加深对党和领袖以及新社会的热爱。”（页 145-146）

红色文化的第一大特点，就是歌德与效忠。“三老四史”教育通过忆苦思甜和今昔对比，大力鼓吹党、毛的恩德，以热爱为起点，以效忠为能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水到渠成。在推广个人崇拜与一党迷信上，这一教育大有功焉。

四、革命人生观和革命理想教育

现在的学校讲“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时的中学似乎只讲两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世界观是唯物唯心，有神无神，离中学生太远。因此，让中学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就成了思政教育最高任务。按照书本上的说法，人生观一看态度，二看目的。革命的人生观要求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人生采取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态度。同时，要求持此观念者为人民利益而生，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据此，它自诩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人生观。

女附中的“学生们学习了国内形势后对参加农业生产，从思想上认识不清，对教育方针，要培养的目标也不够明确，针对学生的思想，从初一到高三全校开展了学习党的教育方针的运动，经过鸣放讨论辩论，教育学生要立志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配合学习组织看了《朝霞》等影片。”（页143）《朝霞》是1959年长影生产的儿童片，影片通过新华小学的勤工俭学，宣传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长影拍这部影片也是为了配合宣传党的教育思想。而放映这部影片是校方的精心选择。

教育方针涉及到学生们的前途，是否心甘情愿地当个普遍劳动者，这是人生态度问题，也是革命理想问题。为了把学生的人生观提高到革命的高度，学校狠抓学生的活思想，经常搜集学生的思想动态。

活思想之一是阶级意识模糊，资产阶级和小资情调泛滥。“初中学生不知道中国社会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什么样的阶级，对于地主阶级，只是从电影《白毛女》等片子里看过，对资本家的认识也如此。”“同学们对《货郎与小姐》《盘夫索夫》《李慧娘》《求婚》感兴趣。老师不让演，学生还瞪眼吵。初三有个学生看《柳毅传书》这部电影看了七遍，另一个学生看了二十遍，初二有个学生爱看十八九世纪的外国文学作品。自己的作文中写‘我像二月的紫罗兰，早熟而易凋’。”

活思想之二是愿意做脑力劳动，不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个出身旧职员的少先队员说，她长大要做医生或工程师，多挣钱，过富裕生活。一个出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员表示，她想考大学，将来做专家，到农村工厂干一辈子，她想不通。还有一位出身资产阶级的群众认为：“可怜那些没上过学，平平淡淡地度过了一生的人。”学校记下了这些人的出身、政治面貌和所在班级，“以便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做工作”。（页 146-147）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女附中的思政工作者要跟人性和常识作战——男女之爱，跨阶级越种族，为什么《白毛女》比《李慧娘》革命？人之心绪有高有低，为什么紫罗兰就是资产阶级？多挣钱，过好生活，乃人性之所在。共产主义不就是让大家都过上富裕生活吗？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就要挨批？既然工作有脑体之分，为什么非要我做体力劳动者？我想当专家学者医生工程师有什么错误？……

在党的保护下，女附中的思政工作者胜利了，有上述活思想的学生们失败了。扭曲的人性和混乱的思想迎来了十年浩劫。■

【调查报告】

关于文革中民众参加群众组织调查的初步报告

乔晞华

笔者自 2017 年 4 月 15 日开始，通过英特网以问卷的形式，对民众在文革中参加群众组织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截止 2018 年 2 月 6 日，共有 314 人参加了调查。（笔者在此向参与调查的受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有的受访者在 1966 年文革开始时年龄太小（小于 12 岁而且未到初中）未采用，实际有效问卷数是 284 人。

现将调查的初步结果向读者汇报如下，供大家参考。该问卷调查有 10 个问题：一、当事人文革时的所在地（省、市）；二、当事人的出生年份；三、性别；四、家庭出身；五、政治面貌；六、职业；七、参加群众组织情况（多选）；八、群众组织属于社会哪一大派；九、参加群众组织的原因；十、是否因参加群众组织而受到审查和处理。受访者只需要一

到两分钟时间在计算机上或在手机上即可完成。以下是受访者地区和年龄的分布情况：

表1 问卷调查受访者年龄和地区分布

来自省份	人数	出生年份	人数
安徽	0.4%	1923—1930	2.2%
北京	24.3%	1931—1935	1.9%
福建	0.7%	1936—1940	3.3%
广东	0.7%	1941	2.2%
广西	3.9%	1942	0.7%
贵州	0.7%	1943	4.4%
湖北	2.5%	1944	3.7%
河北	2.1%	1945	9.3%
黑龙江	2.1%	1946	12.2%
湖南	5.3%	1947	6.7%
河南	0.7%	1948	7.0%
吉林	1.8%	1949	5.6%
江苏	19.0%	1950	8.5%
江西	0.7%	1951	7.4%
辽宁	1.1%	1952	7.4%
内蒙古	1.8%	1953	5.9%
四川	5.3%	1954	3.3%
山东	3.2%	未知	8.2%
上海	9.9%	合计	100%
陕西	2.5%	1966年时 最大年龄43岁 最小年龄12岁 平均年龄19岁	
山西	2.5%		
新疆	3.5%		
云南	0.4%		
浙江	3.2%		
未知	2.1%		
合计	100%		

表1显示,受访者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仅缺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和天津五个省市自治区。受访者最多的来自北京和江苏两地,其次是来自上海、四川、广西和新疆的受访者,均达到10人或以上。从总的分布情况看,调查在地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受访者中年龄最大的是1923年出生,最小的出生于1954年。有的受访者受访时年龄最大的已达94岁(估计是其子女代为填写,因为该调查考虑到年龄问题,可以由了解情况的亲友代填),最小的也达到63岁。他们在文革初期时分别是43岁和12岁。正如学者呼吁的,如果我们再不抓紧时间进行调查,文革的参与者将逝去,再也没有机会对他们进行调查了。

以下是受访者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的分布情况:

表2 问卷调查受访者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分布

家庭出身	人数	政治面貌	人数
革命干部(红类)	19.3%	党团员、积极分子(红类)	28.5%
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农(红类)	24.8%	一般群众(中等类)	55.9%
职员、小业主(中等类)	32.6%	黑五类	14.1%
黑五类	21.9%	其他	1.5%
其他	0.4%	合计	100%
合计	100%		

表2显示,受访者中,家庭出身属于红类的(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占总数的44%,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的占22%,家庭出身中等类的(即职员、小业主、知识分子等)占33%。受访者中政治面貌属于红类的占29%,他们是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受访者属于一般群众的占56%,超过总人数的一半。本人政治面貌属于黑五类的占了总数的14%。以下是受访者职业分布的情况:

表3 问卷调查受访者职业分布

职业	人数
中学生	48.5%
大学生	21.9%
工人	4.1%
下乡知青	9.3%
农民	4.1%
干部、科员、教师	8.9%
无业	1.9%
其他	1.4%
合计	100%

受访者中，学生的比例较大。大、中学生占了总数的70%。干部、科员和教师占9%。工人和农民（含下乡知青）占总数的17%。显然，工人和农民在受访者中的比例偏低。受访者中男性占73%，女性占23%，另有4%未知。女性受访者明显少于男性。

问卷表询问了受访者参加的群众组织属于社会上的哪一个大派。由于问卷调查在这个问题上采用开放式回答，而且受访者来自20多个省市自治区，所以回答五花八门，不易归纳统计，其中不乏一些较著名的群众组织，如北京三司、北京天派、北京地派、清华414、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北京中学43派、河南27公社、长春红革会、川大826、成都826、反到底、呼和浩特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广西422、贵阳红卫兵、新疆红二司、江苏好派、江苏P派、湖北钢派、湖北新派、呼三司、红卫兵成都部队、晋中革命造反总部、晋中炮轰派、晋中总司、黑龙江炮轰派、青岛红卫兵第一总部、四川826、上海红革会、上海红卫兵总部、山西红总站、山西造反兵团、湖北湘江风雷、浙江红暴等等。虽然受访者人数并不算太多，但是他们涉及的群众组织几乎遍布全国。

有68%的受访者在文革中参加了群众组织（包括文革初期的保守组织）。他们参加组织的原因总结如下：

表4 受访者参加群众组织的原因

编号	参加群众组织的原因	人数
1	响应毛的号召	64.8%
2	争取改善政治、经济处境	18.9%
3	对当权派不满	13.3%
4	对受打压者同情	21.4%
5	受同事、亲朋好友影响	13.3%
6	其他	6.7%
7	非响应毛的号召 (2+3+4+5+6)	51.2%

第7个原因是第2至第6个原因的总和。由于这些原因是多项选择，所以其总数并不等于5个原因数的总和，因为有的人同时选择了2个或2个以上的原因。从表4中可以看出，响应毛的号召是最主要的原因，约有65%的参加过群众组织的受访者是由于此原因而投入文革运动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响应毛的号召之外，有51%的民众是因为其他原因投入文革运动的，如争取改善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对当权派不满，同情受打压者。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可以与响应毛的号召相比（51%对决65%）。所以，文革中民众不是没有头脑、没有思考的“疯子”和“傻子”，是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由于上述数据还在收集之中，目前还不能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该调查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数据正在收集中，希望文革的经历者能够协助参与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链接是：

<https://surveynuts.com/surveys/take?id=133016&c=2104845201JTVP>



【述往】

困惑的革命年代

刘沂伦

1964年秋天，因父母调动工作我从杭州转学到北京，进入师大女附中高二年级。从杭州著名的重点中学——杭州第一中学(现杭州高级中九七学)转到北京这所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我似乎没有产生多少兴奋和新奇感，反而是开学后遇到的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令我倍感纠结。

刻骨铭心的自我革命

从1963年起，阶级斗争的风一天天紧起来。1964年被今天称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展。我的父亲在东北的一个部属大厂主持“社教”运动，而我的母亲则在长沙步兵学校参加政治学习。

他们都全心全意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把我和三个弟妹交给保姆。我母亲经常来信谈她的学习心得体会，我父亲则利用回京的机会把我们姐弟几个叫一块儿宣讲什么是“四清”“社教”运动的意义他在蹲点厂如何搞“社教”。那时的特殊名词很多，什么“上楼”“下楼”“洗澡”“四清”“四不清”，听得我稀里糊涂，更别说我那三个幼小的弟妹了。我们家的政治气氛从来没有如此浓厚热烈过。

但是，家里的政治气氛再浓厚也比不上学校。本来，在我懵懵懂懂的意识里，阶级斗争完全是外面的风景——阶级敌人或者是北方的修正主义或者是海峡那边的敌对势力。在杭州一中，我们读“九评”，笑谈北方的修正主义，互相传告有关“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的动向，而我们自己(尤其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则是“装进保险箱里的革命青年”。没想到，进入北京这所著名的中学，迎面而来的是一场虽然不算大但却令我刻骨铭心的自我革命。

政治课上自揭“私心杂念”

开学后的第一堂政治课，老师就宣布本学期政治课要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育方法是自己揭发自己的“私心杂念”，自我批判，每一个团员和要求进步的同学都要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灵魂深处的“私”字，把各种“私心杂念”亮出来才能彻底抛掉。如此云云。

然后，干部们就开会研究怎样搞好这个运动，无非就是团干部带头亮“私”字，然后班干部、团员带头，然后积极分子，然后一般同学。总之没有人可以逃避，如果不肯交待自己有什么肮脏的私心杂念，那么她是不可能把自己改造成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那她会怎样呢？那时没有哪个年轻人可以想象自己不能成为革命者将会如何。

第二节政治课上，班干部们就开始带头狠斗“私”字了。我的同桌就是一位团支部干部，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这当然是一种安排，因为我是新生，又属于积极分子，她承担了了解和培养我的责任。“积极分子”这个称号是特指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的同学，我上初三时随大流地交过一份入团申请，但直到毕业也没有发展我入团。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又是个革命干部子弟，为什么不让我入团呢？后来我知道有那么几个原因：一是我从来不主动向组织汇报思想（当时的说法叫“不积极靠拢组织”）二是我比较自由散漫，这是我的一个很顽固的毛病，几乎伴随我整个成长岁月，在我12年24个学期的操行评定上几乎总是能看见“自由散漫”这四个字 三是我喜欢和一些“落后”同学在一起玩，而并不打听她们的家庭出身，甚至也不“重在表现”，也就是阶级立场不太坚定。到了高一，我那个自由散漫以及喜欢和落后同学在一起玩的毛病非但没有改掉，而且我自己也快变成“落后”同学了。以致于到今天我还怀疑，我能考上杭州一流的重点中学（高中）是不是多少沾了家庭出身的光呢？要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重视阶级成分的年月。我对入团的事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和那些团员干部们在一起，我总嫌他们太正经，不活泼，不快乐。

但是我初中时递交的入团申请书被装进了档案，所以我依然被列入积极分子一档。

我的同桌在领导布置了任务的第二堂政治课上就开始带头揭批自己的“私”字。她揭发自己的私心杂念大多是一些优点中的缺点或因优秀而产生的缺点，比如骄傲自满，有虚荣心。我想她说的倒也是实话，作为一个团干部当然是优点很多的。她说了很多，具体内容我早已忘记。我们知道，有些缺点是带有光环的，比如骄傲自满，只有优秀才有资格骄傲，平庸的人凭什么骄傲？比如“只专不红”，那肯定是学习好的同学才配具有的缺点，学习不好那肯定是既不“专”也不“红”。再比如虚荣心，追求上进，向往成功的人就容易有虚荣心。像我这样自由散漫从来不主动向组织汇报活思想的人，哪有什么虚荣心，所以，单是揭批上述的这些“私”字就缺少感染力，或者说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为了增强榜样的力量，为了更好地带动大家搞好自我教育，到了第三节政治课时，我的同桌就说了这么一件小事。

她的父亲曾赴国外参加援建工程，期间回国休假时穿了一件很时髦的衬衫。她说，那种衬衫颜色特好，特挺，特好洗，晾一会儿就干了（这时就有同学插话说是“的确良”吧？）。“我爸说下次回国也给我带一件，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天天想着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我这种思想挺不好的，追求吃穿，发展下去就会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总之，我的同桌说她骄傲自满、有虚荣心、追求吃穿，都是由于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

同桌的自我揭批让我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恐慌，我不知道我该从我那傻乎乎的大脑里挖点什么出来才能过关。上面我提到的带有光环的缺点我基本上不具有，那么我有资格具备的缺点或私心杂念是什么呢？

我不是个优秀的学生，所以什么骄傲自满、“只专不红”之类的“私”字好像离我远了点。我只能说我学习不刻苦，上课经常走神或和旁边的同学说闲话，我平时说话还很不注意，有点自由主义（此自由主义和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们所信仰的不是一回事）但是优秀同学的自我揭批让我感觉到仅仅挖出这么一点“私”字是过不了关的。

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看大部头的书，初中时因为母亲管教严，看小说还没有压倒正规学习。到了高中，父母自己忙于阶级斗争疏于对孩子们的管教，看小说就成了我的第一爱好。我课余用在看小说上的时间大大超过做功课的时间，甚至上自习课时也埋着头偷看小说。

“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国内外小说我几乎都读过。小学二年级读的第一部厚书《一千零一夜》中那聪明美丽的王后新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部《林海雪原》少剑波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偶像。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所有革命文学中的男一号都是我的偶像，而所有的女主角如“小白鸽”白茹、林道静等都是我既羡慕又嫉妒的对象——她们是那么的美丽热情，还有心爱的男友和她们一起从事壮丽浪漫的事业。

我常常想入非非，幻想自己也能有那样的“白马王子”陪伴，想到我的同桌希望有一件“的确良”衬衫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我的关于男女爱情的翩翩联想岂不是更糟糕了？简直可以定性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段时间，同学们都根据各自的身份，比如团支委、班干部，按顺序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虽然不是很热烈，但也没有人拒不发言，很像一群温顺的绵羊。大家都拼命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翻找自己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从吃到穿，从爱好到不爱好，包括类似我喜欢看小说中温情浪漫章节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全校大会的典型发言中，我甚至听见有外班同学批判自己有当女总理的愿望，是野心家！

虽然已经有团员同学勇敢坦率地承认，自己看课外书喜欢看男女恋爱的部分。可我还是不敢紧跟而上，她们是好学生，有这么点儿问题不算什么，而对我来说，目前的班集体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我又不是好学生，没有什么优势可以遮蔽一下“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段时间，我总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看了小说后

的遐想彻底交代。说呢，怕自己在同学心目中变成一个很无耻很下贱的人。不说呢，又觉得既然自己有这种私心杂念，不揭批总是不好，至少是不革命的表现。我毕竟是一个革命后代，虽然自由散漫，但还是向往进步和革命。而要革命，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首先应该敢于革自己“私”字的命，这点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整个金秋九月，我就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着，思想斗争着，简直像个犯人在公安人员强大的审讯攻势面前犹豫着。交代，还是不交代？

我的担心多余了

好在我是个新生，好在我们这个班里团员占一多半，加上还有几个非团员的干部。比如课代表、小组长之类的。等排到我发言要一个多月，而学校团委的运动计划似乎没有那么长时间。

国庆节前，老师就宣布没发言的同学就不再口头自我揭批了，写个书面的思想总结交上来。这下我就像获得了解放一样，顿时浑身上下轻松无比。而老师又说发过言的同学也写一份书面总结，这样一来，我简直就有赚了一把的感觉。写书面总结好办，老老实实地揭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肮脏的私心杂念就是了。我虽然害怕这种自我教育的运动，但是绝不反对，相反从心里拥护，就像全国人民真心拥护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我只希望这份书面总结千万不要被团支部、班委会的干部们传来传去就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这场运动在开了一两次大会请了几个同学做典型发言后就结束了。

我有点害怕入团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很快就被团支部确定为重点发展对象，并且当年11月就入了团。在批准我入团之前，团委书记特地找我谈话，要我好好读书，否则就对不起团委对我的培养等等。她的谈话并没有让我感动，因为经过那场“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我有点害

怕入团了。我害怕在发展会上像一个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上的人那样任人解剖我的心灵。所以我后来也没有去找团干部汇报过思想，我只想得过且过继续当一个普通的学生。

害怕归害怕，万万不可拒绝，还是要老实地填表宣读，好在入团的发展会上居然没有人提到我的书面“自我揭批”。于是我就知道我的那份“斗私批修”总结还在老师的抽屉里睡觉呢，这使我心理上轻松了不少。为什么这么快就发展我入团？在发展会上，听了介绍人和团支书的发言，我估计主要缘于春天我还在杭州时的一件事。那时我们下乡劳动，有一天，一个农户的家里着火了损失惨重。那天还下着雨，农户家的房屋完全倒塌了，可怜的一点家具物件全泡在雨水里，一个小男孩站在烧黑的檩条旁不停地哭。我看他哭得着实伤心，不由得同情心大发，当即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大概一两元，在当时就算很不少了）塞到那男孩手里。事后经大队证明，该受灾农户属“贫下中农”，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我阶级感情深厚的证明。

这“阶级感情”的分量还真是很重，但是入团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知道有些学习刻苦的同学，她们比我优秀得多，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入团。有同学就在课间很含蓄地向我的同桌（团干部）表示不服气，我再木讷也能听出话里的话。同桌不知道我心里也很内疚，仿佛欠了她一笔债。在这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月里，不太想入团的因为“家庭出身好”“阶级感情深厚”入了团。迫切要求入团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入团，说来说去，真是“进步”二字好辛苦！

总而言之，1964年的秋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愉快。这种不愉快和小时候跟同学吵架，丢失一样心爱的玩具，挨父母一顿斥责，所带来的不愉快不是同一种感觉。彼“不愉快”很快就会忘记，此“不愉快”却牢牢扎在心里，使我第一次感到人生的困惑和烦恼，感到社会环境的不和谐。

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时代的残酷。■

【述往】

被热情分裂 被浩劫警醒

——我在女附中的心路历程

顾 媛

1962-1968年，我在师大女附中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回想母校留给我的一切，我心中回荡着亲情与爱意，却又夹杂着莫名的悲哀与遗憾。这矛盾的情感显然是与那个特定的年代分不开的。

优秀女性的摇篮

1962年秋，我从史家胡同小学，姐姐顾潮从女二中分别考上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和高中。当迈进这座“全国最优秀女中”的大门时，我们心中的骄傲与兴奋自不待言。当时国家正从三年困难时期逐渐复苏，在相对自由宽松的大气候中，女附中的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无论是校领导胡志涛校长和刘秀莹主任，还是从“姐姐班”来帮助我们“初一小妹妹”的辅导员夏树和夏莹，都牢牢吸引着我——她们美丽而干练的形象，高贵而典雅的气质，亲切而犀利的目光，温和而贴切的话语，都让我感受到优秀女性的强烈魅力，她们立即成为我的榜样。

还有那些亲爱的老师们：语文老师刘超尘、数学老师储瑞年和金元、物理老师刘希璞、体育老师夏克若、生物老师白正衡、音乐老师吴德棻……他们通过逻辑性与想象力极强的讲授，引人入胜的分析与推论，师生互动，生动风趣的教学活动，把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理解，对知识求索的浓厚兴趣以及做人做事的高度事业心与责任感传递给莘莘学子。他们敬业爱生的形象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女附中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即今天的“素质教育”),各式各样的歌咏比赛文艺汇演、体育比赛、作文比赛、数学比赛几乎每周都有新的表演或赛事在吸引我们。此外还有北京市少年宫,什刹海业余体校和北京少年科技馆的兴趣小组。通过简单的考试即可长期参加活动,每天课后几乎人人都不会闲着。

我参加了两项课外活,学校的田径队和少年科技馆天文组,我在田径比赛中没有哪一项表现突出。夏克若老师就让我练“三项全能”即跑、跳、投三项,要求体能相对均衡。我每天早晨六点半到校,长跑3000米(跑到复兴门外再返回)。下午下课后还有一个小时的专门训练。真正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当时觉得真苦。有两次跑回学校甚至出现了晕厥现象,到医务室躺一会儿,铃声一响,爬起来就去上课。这种近似极限的锻炼给了我一个充满活力的体魄和顽强的毅力。每周四下午课后徜徉在北海公园的绿树红墙,鸟语花香中,这些活动除了赋予我探索宇宙的知识和兴趣,更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心灵的美感。

那时北京的天空十分晴朗,既无雾霾也无污染。通过古庙的天窗用望远镜探索星空遥望大熊和仙后星座绕着北极星旋转。牛郎织女携天鹅星座飞翔在浩瀚的银河,细数月球上的环形山、木星、卫星和土星美丽的光环,聆听辅导员富有魅力的讲解……那些场景至今仍深藏在我心底。以后在人生途中无论翻山越岭、跋涉草原,只要抬头仰望璀璨的星空,往往能苦中作乐,美不胜收。

被“革命热情”分裂

女附中的传统之一——“革命热情高”,是全市有名的。1963年的学需锋运动,1964年的学“硬骨头”六连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以及1965年的反帝反修阶级路线教育,更把这种热情推向了顶点。可以说,这是为文革中女附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50年过去了，有几幕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挥之不去。

大概是1964年冬天，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团委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由我们的姐姐班高三(5)班的同学，化装成抗日时期的青年学生模样，进行了一场救亡歌曲大联唱。莫莉、刘景艾等同学女扮男装，表演得慷慨激昂：“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雄壮的歌声使整个礼堂沸腾起来。当时情感上的震撼，令我至今难忘。灾难深重的祖国历来不乏爱国志士、热血青年，我们作为革命接班人，能不像先辈那样以天下为己吗？

女附中的学生有股子拼命精神，每次下乡劳动都是争先恐后，自找苦吃，记得1965年中考结束后，我们班十几个同学不甘寂寞，自发组织社会实践，到四季青公社西冉村大队去干农活。郊区农村的社队干部都知道女附中的学生肯干能干，联系电话打过去就欣然接受。

我们住在村小学教室，睡在草垫子上，晚上被蚊子叮咬起了浑身的大包。早上喝碗粥就下地，顶着7月似火的骄阳给菜地拔草，脚蹲麻了就跪着拔，汗水迷了眼睛用衣襟擦，谁也不停手。休息时大家坐在田垅上，一边畅饮着挑来的开水，一边就唱起了《歌唱二小放牛郎》。这是我们班在音乐吴老师和高三大姐姐郭平英辅导下练就的四部大合唱。其气势之宏大、音域之宽广、处理之细腻、合作之默契，对于我们都是空前的。全班同学都十分投入，即使在原野上干农活，十几人一起放开喉咙，各声部依然配合得当，唱得荡气回肠。唱罢回头一看，才发现周围干活的老乡和孩子们都聚拢过来听着，并对我们热烈鼓掌叫好！于是我们便接着搞起了“革命歌曲大联唱”，让“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的歌声随风飘扬！那时候心里真是美极了！

然而“革命热情的另一面，是相当的无知、片面与狂热。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女附中学生被卷进了“斗私批修”的狂潮中，我个人也从此结束了快乐浪漫的少年时代。

初二年级满15岁时，本来我是班上第二批入团对象，表已经填好，却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挡住了。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整整两年时间，眼看着身边我的“帮扶对象”一个

个戴上了光荣的团徽，而我却被关到了团组织门外。无论我如何努力学习与工作，在保持全优成绩的同时，作为中队长带领全班同学夺得“四好中队”的荣誉，却永远戴着“出身不好”的帽子。不是老师和团干部不关心我，她们多次找我谈心，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认识和批判家庭。也不是我不开窍，对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对父亲的认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经过民族资产阶级，一直上纲到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但是，我就是得不到组织的首肯。

剥削阶级烙印何日才能去掉？什么样的思想改造才叫脱胎换骨？郁闷！迷茫！常常后悔没能生在战争年代，为此初中毕业时下决心去农村插队，以求彻底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却被老师以“不考高中就是没做到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就是“不让党来选择你的前途，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这些严厉的批评打消了念头……。

那两年，我的头脑和心灵被分裂了。“学习优秀”变成了“白专道路”，“积极上进”变成了“伪装的另类”。“革命热情”越高就觉得自己越是“罪孽深重”——直至无所适从。看到猫儿在院中嬉戏都会感觉羡慕：“我何时能像它们那样无忧无虑呢？”这是我“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童年与少年的一个句号，是我人生中最早遭遇的严重挫折。

浩劫中的警醒

1966年文革风暴袭来不久，我成了“狗崽子”。尽管前几年的挫折已有预警信号，但那时毕竟还能得到师友的关怀。现在，环境骤然变了，一切知心人都疏远了我。原来信仰的东西崩溃了，原来依赖的朋友找不到了，一切要靠自己。而我自己原是什么都没有的，即使有过些什么，也早在前几年的“脱胎换骨”中丢掉了。我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心里的苦闷自不待言。

学校组织到昌平马池口公社秋收劳动，我报了名。红卫兵们都去造反了、串联了，剩下的多是一些跟我一样的“黑五类”。本想下乡秋收多流点汗能让心里踏实些，谁知反而

陷得更深。

早晨一睁眼，就被一些“红外围”严加管束，晚饭后必得“闭门思过”。用汗流浃背的割稻和虔诚的语言为自己赎罪，却看不到这种改造有什么出路。做事战战兢兢，动辄遭到一顿训斥，还被勒令不准接触老乡——因为“你们这些有严重问题的人，只准老老实实改造，不许去跟贫下中农拉关系！”“不许交头接耳，互相串联！”……劳改犯般的政治待遇，使我这个向来激情洋溢的人几乎窒息了。我抗争过、怒骂过、哭泣过，但得到的答案除了更不堪入耳的责骂嘲讽外，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一天晚饭后暴雨刚过，我趁人不注意，独自溜出村子无目的地乱走。

此时天上浓云未散，还飘着细细的雨丝，夕阳在山背后放射出余辉，空气格外清新。我穿过庄稼地，进入西山脚下的果树林，接着是密密层层的杨树林，松树林，树叶上悬挂着水珠，芳草散发着香气，耳边鸟语啾啾，溪水潺潺，令人陶醉。走着走着，我忽然眼前一亮，绿草如茵的林中空地上出现了一池清泉，大约有两张八仙桌面大，中心的泉眼咕嘟嘟地冒着水泡，一串串、亮晶晶地升到水面上，滋润着池边的青石与小草。啊！这就是那溪水的源头！我狂喜地奔过去，扑到池边，俯下身来，捧起泉水大口地喝着、洗着、尽情地享受着，在那仙境中流连忘返。沐浴在那么纯净甜美的泉水中，多日来的郁闷一扫而光。上帝啊，我真心感谢你慷慨的赐予！

天完全黑了，我不得不离开树林。

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的心里却渐渐明亮起来。我感到自己悟出了一个道理，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泉水的生命在于不停地流淌，大自然的美好在于生生不息，人的生命在于不断进取，大自然是慈悲的，人民的胸怀是博大的，只要坚持走下去，就“天无绝人之路”。正如《怎么办》中的一句话：“无论土壤怎么样，我们终归可以在那里面至少碰到一小块能够长出健康的麦穗的地方”。就在这囚徒似的生活里，我不是也碰到了这样美好的一池清泉吗？关键是要冲出樊笼去找。人间的万象真理要靠自己去求索，不能听任别人摆布自己的生活！

此后在劳动之余，我常常偷跑到那泉边去消磨时光，渐渐感到自己的心境也变得如同那泉水一般的清澈与平静。我不再希求得到别人的恩赐，不再想依靠别人指明自己的道路。我看到自己的出路了——那就是到农村去，到基层群众中去，到大自然中去。在那里付出自己的劳动，认识自然和社会，求得精神上的解放，重新认识并造就自己，寻求自己的新生活——一个有完整、正常人格的人的生活。

我确实这样做了。

1968年底，我离开女附中去莫力达瓦旗插队，在黑土地上做了赤脚医生，从此走上一生为中国百姓的健康，特别是为全科医生事业的奔忙之路。尽管道路曲折艰难、荆棘丛生，我却到处都能获得支撑的能量。其中最根本、最长久的支撑之一是在浩劫中，在京郊西山脚下遇到的那一泓清泉。是它给予我的启示。

人生途中总会有风浪，年轻时经历的挫折增强了我的精神免疫力，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女附中，我挚爱的母校，我感谢你给予我的一切。■

【述往】

我所经历的“三查”和“土改”

晏乐斌

1950年12月，我在就读的岳阳县美国基督教复初会创办的湖滨中学高中部学习时，响应周恩来总理动员青年学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离开学校参军。从那时到2010年12月刚好是60年。60年的经历不容易啊！60年的前27年我参加的这个被人们誉为“最理想、最美好、最幸福、最令人羡慕、公平、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的革命营垒”，“人们向往的天堂”，“锻炼人的革命熔炉”，对我们这些幼稚无暇、天真的青年学子来说，

多么吸引人啊！经过60年的洗礼、体验、观察和实践，远不是人们所宣传、教育的那样完美、美好，有差距，且距离甚大。

前27年，我所碰到和经历的是政治运动一个挨着一个。

一、“三查”运动

“三查”运动。当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各地各族人民中展开，政府号召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青年学生踊跃参军；土地改革后的农民出现了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参军的热潮；政府号召人民、干部、职工对有利于抗美援朝和革命的事、话和行为就做，不利于抗美援朝和革命的事、话就不做、不说。我们所在的中南公安干部学校，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查思想（即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毛泽东思想、言论）、查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革命利益上去说话、做事、想问题）、查历史（向组织交代清楚自己的家庭、个人历史、社会关系）的“三查”运动，凡是与此相背离，与革命利益不利的，都要向组织交代清楚，以便组织审查、了解和掌握。我幼小从家门到学校门，进入到这个营垒里，第一次遇到这类新鲜事，那时我年轻的心灵与胸怀是坦荡的、无私的，自然毫无顾忌地将我自出生以来，从记事起，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毫无保留地将我的经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全部地交待了出来，包括口头和文字的，让组织来了解、掌握。这种交待是自觉自愿的，抱着对组织虔诚的心情，对共产党组织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十几岁幼稚无瑕的孩子，对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把共产党和祖国当作母亲一样对待和忠诚，一片赤诚之心。

有这么一件事我终身难忘。当年4月，我接到我们湖滨中学一位同学的来信，在信里谈起了教我们动物、植物课的高乾久老师被公安局抓去当国民党特务枪杀了。当时我觉得是一件大事，便在学习小组会上谈了出来，估计学习组长胥春涛作了记录，向组织作了汇报，可能载入了我的人事档案。

这本是与我不关的事，可是到了文革期间，我所在的贵州省公安厅的组织、造反派将我打成“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隔离揪斗我时，追查我的“特嫌”问题来了，多次追问批斗，要我交代，我真是莫名其妙，无言以对。当时的组织和造反派两次派人到我的家乡湖南岳阳县去调查，因为没有捞到任何证据，才不了了之。我就纳闷：老师高乾久是特务，学生也变成特务吗？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鸡蛋里挑骨头，捕风捉影，无所不用其极。1985年岳阳县法院为高老师纠正、平反昭雪（另题论述）。

通过几个月的政治审查，公安业务学习结束。1951年6月30日，我与李中秀、朱仲鹤、彭金芝等十来位同学分配到中南公安部执行处工作。

二、土地改革运动

我在执行处工作了2个月，到9月初，我与彭金枝（女）同学，被机关抽去参加中南直属机关土改工作团，到湖南资兴县波水乡土改工作队。我们先是在长沙市学习了几天的土改政策，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怎么访贫问苦、工作方法等等问题之后，于9月7日即到了资兴县的波水乡云河村，立即开展工作。我与我们中南公安部二处的王沛三科长、科员张捷先三人在这个村子，彭金枝同其它同来的同事，分在其它村子。王、张二位是老同志，带着我这个刚入机关门的新手。这个村子是个高山区，山大沟深，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120多户人家600多口人，分成七八个村寨，分布在十多里的山沟里，有陈、吴、邹、李、王等杂姓，陈姓人为多。开始，我们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寻找土改依靠的根子，作为依靠的对象。我因为刚步入社会，什么都不懂，一切以老同志的意志行事，跟着他们学习，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生怕犯阶级立场的错误。土改工作，接触群众，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等等这些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我抱着在土改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提高认识、识别事物的能力与经验，在这里三个多月里工作学到了不少东西、经验，比如如何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动依靠什么人，识别人，站稳阶级立场，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等。群众

发动起来之后，那些土改积极分子出现捆绑吊打他们认为的地主、富农分子等违反政策的行为，如何做疏导、教育等工作方法。

在这个村子土改工作过程中，有两件终生难忘的事。

地主陈广寒，70多岁，原在村里教私塾和小学几十年，其父是一位老中医，家开有中药铺，为人治病，积蓄了一些资产，购买了十几亩土地出租。有三男二女均已成家立业，另立门户。土改中陈广寒出租土地收入占其全家全年总收入的27%，超过了划富农成分剥削收入25%的2%，按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若干问题决定》的规定，应定为富农成分。他教书收入占全家总收入的50%以上，但是当地的一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和乡里干部要定他家为地主。他们认为本地土地少，不将他定为地主，不没收他家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到哪里去找土地分给贫农、雇农。我们将此向县里反映，县里反说我们没有从实际出发，思想右倾，死扣条文。结果，将陈定为地主成分。在群众斗争大会上，一些人威逼他交出“浮财”，他交不出来，就将其捆绑吊打起来。陈本人是一个文化人，也了解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界线，他在斗争他的大会上进行申辩，说，他教了一辈子的书，以教书为职业，父亲是医生，为人治病，救死扶伤，一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父亲都不收他们的医药费，用教书和为人治病积累起来的钱，购买了十几亩土地，家里无劳力耕种，租给没有土地的人耕种，既养活了他们家里人，我家也收一些报酬，双方互利互惠，这犯了什么王法？把我家定为地主，我就是不服。他的这一番话语，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同情，特别是受过他父亲治病，没有收医药费的人的同情，有的人站出来为其说话，可是，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其中一些年轻人一上来就殴打陈广寒，我们上去制止，遭到一些人的阻拦，乡土改工作队来参加这一斗争会的队员，则冷眼旁观。这些动手打人的人，见我们工作队的负责人（实际是乡里来的）默认，而不加制止，便将陈捆绑起来，一个已70多岁的老人，折腾了大半天，最后将陈广寒吊打致死。后来我们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材料，送到资兴县土改工作团，最后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参与捆绑吊打陈广寒的人，我们事后作过调查，是几个劣迹斑斑、好逸恶劳的陈炳德、陈炳黄、陈亚平等人。其中，陈炳德曾强奸陈广寒的二女儿陈一敏（初中文化）未遂。为此，陈广寒报告陈姓家族族长，该族长聚集陈姓族人，在陈氏宗祠里当众打过陈炳德的板子（即打屁股），以警示他人。为此，陈炳德在族人面前受辱，总想找机会报复。陈炳德在捆绑吊打陈广寒时，事先找了他堂弟、游手好闲的陈炳黄与族弟陈亚平等人当帮凶。陈给打死后，无人过问，我们向乡土改工作队作了反映，要求严肃处理。乡土改工作队对我们说，群众发动起来了，热情高涨，难免不出偏差，出现过火行为，我们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要给群众拔冷水。就此不了了之。

地主吴焕平，是该村吴家沟人，父母早亡，留下他和一个十来岁的妹妹，二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后在一位堂叔的谋划下，妹妹给人当童养媳去了。他十五六岁为邻近一个乡的人家去当长工七八年，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灾，泥石流将他家仅有的二间草房冲垮淹没。1920年末他不再为那家人做长工回到老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好借住在堂叔的半间破房里，为人打短工，苦苦煎熬，慢慢积蓄了一些钱，将堂叔借给他住的半间破房，修补成一间房栖身，生活逐渐好转起来。因为人勤奋，在这位堂叔的帮助推荐下，结婚成家，后生育两个儿子。一家四口人，依靠他们自己的双手，省吃俭用，生活逐渐有所好转。从牙缝里积累，到了1940年代中期购买了七八亩土地和修建了几间房屋。土地由他和两个儿子耕种，家里又开办了酿造白酒的作坊，雇了两个酿酒师傅，因人手不够，出租了四亩土地。土改开始后，划他家为富农，其出租土地的收入占其全家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五。最后拔高定他家为地主成分，土地、房屋和酒作坊被没收。土改中他逃过了批斗。

当地是山区，地少，土地贫瘠，我们刚到这个县时，县里的土改工作团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这里地理条件差，农民普遍比平原富裕地区的贫困得多，所以不能套用地理条件好、富裕地区的土改办法，要特殊对待，要为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着想。我们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工作的，

1951年12月底，结束了在这个村子，也就是在这个县的土改工作，王、张二位同志回到汉口的机关，我又被抽调到广东钦州县（现属广西）永富乡土改工作队队部工作。工作到1952年3月底结束，回到汉口的机关。

土改中对地、富分子的残酷刑罚，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使用的花样有：苏秦背剑、猴子抱桩、吊死猪、压杠子、仙女散花、点天灯等等，五花八门的刑罚达二十多种。我的同事殷奇同志告诉我，1950年冬，他参加湖南澧县云山乡的土改工作，在斗地主陈连池要他交出浮财，他交不出时，插一个漏斗在他的肛门里，然后用开水灌，此人惨叫，昏死过去。他的肛门和肛门周围肌肉与大肠溃烂，因忍受不了酷刑，当夜投水自杀。还追逼他当过国民党兵的大儿子私藏枪支问题，将他儿子仰放在一块门板上，用一根圆木压在他身上，两边各一人压在圆木上，从他的胸部往腿部压，当压到胸部时，他惨叫，口出鲜血，还不罢休，压到腹部时，肠子被压了出来，压到腿部时，腿骨发出“咯咯”的声音，当场惨死。行刑者，有一部分是土改中扎根串连，被当成土改积极分子依靠，实际是农村中的一些游手好闲，劣迹斑斑的无赖、地痞流氓。行刑者搞刑讯逼供、违法乱纪的都是这些人，多数老实农民是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的。

地租剥削是造成农村

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吗？

土地改革已结束60年了，这场运动有一些问题与理论值得人们深思与探讨。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农民是“大贫和小贫”的问题，不是什么“剥削与被剥削”，更不能把农村人民划分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农作为敌人来对待，对其进行专政，从肉体上进行摧残与消灭；“被剥削阶级”的贫农、雇农，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以贫农、雇农的利益、是非为标准来划线。这是夺取政权的执政者按苏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并按照自己的意志，一种极端的政治手段，而这种政治手段，是当今世界

法治、民主国家所从来没有过的，也是法制所不容的，这是极权政治用来对付臣服的子民的一种特有手段和政策，它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立法机关的论证、立项、审查、审核、表决通过，完全是依据夺取政权的政治利益集团的意志为意志，强加给全国亿万人民，创造出了“地租剥削”、“信贷剥削”农民，“罪该万死”，“剥削是造成农民贫困”，“农村、农业落后”，“国家落后”，“地主、富农与官府勾结”的封建主义，是“构成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之一，把出租土地和出租部分土地的人家划定为地主和富农，将认定的“地主、富农”作为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封建主义势力”对待，地主、富农在旧社会也受官府的压迫、剥削，只有极少数的地、富分子与官府勾结，做一些坏事，怎么将在土改划定的地、富阶级与执掌政权的统治者，统称为“封建主义”势力，作为敌人加以消灭呢？这一理论在中国延续了几十年，至今人们还在颂扬，津津乐道。

中国农村、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地租剥削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历代执政的统治者不是在政策上、经济上扶持，科技方面帮助引导，更多的是向农民索取、压榨、奴役。历代统治者的财政收入、开支主要来自农民，使农民喘不过气来；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拒不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借以调整自己，适应形势，而是采取自我封闭，闭关自守。这是我国贫穷落后的主因，统治者要负责。就我国农村地区来说，离不开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因为整个国家是封闭的，几千年以来我国农民维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信息不灵，交通不便，许多农村几乎是一潭死水，这是其一。第二，我国农民整体素质低下，过去农民中的文盲、半文盲达90%至95%，许多农民狭隘、自私、保守，不思进取，自甘落后，安于现状等因素。第三，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或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石漠化等环境所迫。这些是造成农村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将农村和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剥削制度造成的呢？因为早期共产党里绝大多数成员是由农民组成的，夺取政权是依靠农民的支援而取得的，也曾给农民以许诺，农民从财力、物力、人力予以支持，帮助共产党夺取天下，没有农民

的支援将一事无成。当年在湖北黄安县的街头墙上就写着：“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的标语。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实现许诺，报答农民，给农民以实惠，“创造”了一套理论，说“地主、富农剥削农民”，“农民的贫穷是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打倒封建剥削制度，农民才能根本翻身，过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农民的愿望与意志制定政策，1950年6月30日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名义，制定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阶级政策，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将农村拥有土地，部分拥有土地，或少量土地和没有土地的人，人为地划分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贫农、下中农和雇农等等级，无偿的剥夺、没收拥有土地的人的利益，进行土改，将土地分配给贫农、下中农和雇农。这场土改，从1946、1947年华北、东北地区开始，到1950年冬在全国全面铺开，农民刚刚得到土改后的好处，1953年又开始搞农业合作化，即由分散的农户，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又实行公社化，将农民的土地剥夺去搞大集体。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又搞“联产承包制”，分田地到户，实际是土地国有化，由国家控制起来了，折腾了三十多年又回到原来的一家一户的路上来。土改，原来的初衷是让农民大家共同富裕起来，其结果未能如愿，相反又出现贫富差距，而且有的地区这种差距拉大。可是搞合作化、公社化大集体的结果，也就是“大锅饭”的结果，养懒了一批人，农民还是未富裕起来，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亿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几亿人身患浮肿病，几年间饿死几千万人，受灾难的还是农民。现在看来，这些做法是失败的，得不偿失，几番折腾，农民遭了罪，受了苦。

我们再来看一看农村拥有土地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土地是怎么来的？我1951年秋至1952年春被机关里抽去参加中南直属机关土改工作团，到湖南资兴县和广东钦州县搞了两轮土地改革工作达半年多之久。那里划分地主、富农成分的家庭结合我家乡的情况，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有人在城里经商、做手工艺，或在政界、军界谋事，积累了一些钱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业经济不发达，商品不流通，又无别的门路或别的生计投资的情况下，人们只有将积蓄的钱购买土地，并出租其中的大部分或部分土地；

二、因为持家和操持家务有方和有别的技艺、职业，祖传有土地，善于经营管理，有经营头脑，善于运作，适时耕作、种植，不断积累，购买土地，除自己耕种外，或雇用雇工耕种或出租；

三、勤俭持家，勤俭劳作，省吃俭用积累财富，购置土地出租，或因遇到政府抽壮丁或天灾人祸，或家庭有病人久治不愈，无法耕种土地，不得不出租一部分。这类人家本身劳动，或遇外因不得不出租，在风调雨顺年景、生活上能过得去，灾荒年景也缺衣少食，与贫苦人家一样贫困。

以上三种情况的家庭，其出租的部分收入或贷款利息收入，占全家收入的50%以上的，按《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规定，被划为地主；其收入超过全家收入25%的，被定为富农；超过18%，划为富裕中农。

这两个县在这次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家庭，其土地和财产的来源，没有发现有巧取豪夺、霸占、抢占、勒索、盗窃等非法手段而成地主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为人精明，勤俭持家，且善于持家，善于经营管理，精耕细作，不误农时，且门路宽，路子活，办法多，想尽办法致富。

就全国范围来看，有巧取豪夺霸占田产，有小斗小秤出、大斗大秤进，或与官府勾结，依仗权势欺压百姓，夺妻霸女，或杀人劫货暴富，或发国难财致富，其家庭妻妾、佣人成群，就像四川大邑县刘文采，山东牟平县牟二黑子，广西钦州县的刘家（清代抗法英雄刘永富的后代），拥有良田千顷，这样的大地主、大富豪家庭，毕竟是极少数，可谓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采的泥塑《地主收租院》，文革中被极大的夸大、编造了。

这里要说清楚的是，出租土地收取一定的报酬，贷款收取一定的息金，出租房屋收取一定的租金，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天经地义，一个愿租种、愿贷款，一个愿出租、愿放贷，两厢情愿，怎么就成了剥削？这是什么理论，什么法律条文？只有某些执政者、夺取政权的人才能创造这样的理论和制造的这样的“法律”出来。城市里的工商业，手工业的公私合营，也是这个理论。一句话，这是剥夺。

土改中所划定的、共产党在农村依靠的对象——贫农、下中农、雇农的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就我们老家晏冲村来说，这里离水陆交通便利、信息灵的岳川县城 50 公里，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交通闭塞，完全是一个封闭的村子，农民要想致富十分困难。这里的贫农、雇农是什么情况呢？

一、有受剥削因素而贫困的。如晏荣华，因为家里穷，父母又没有什么本事、能耐，七八岁时其父就将他送到检田兰家村一户较为富裕的人家放牛，只给他饭吃没有报酬。他的大弟刚生下来，因家里穷，被送给本地公田乡彭昌村袁家，后取名袁遂初。其父母因身患重病无钱医治，双双离开人世，还留下一个四五岁的弟弟晏蒲生，无人抚育，只好由其伯父晏梓臣照料。晏荣华在这一家当了十多年长工，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为这一家劳动，后来一年只给他一石谷的报酬（约八九十我也，斤为一石），连自己的弟弟都无法养活和照料。他的弟弟成长到十多岁，因不堪伯父的虐待，外出参加国民党部队了，就一直再没有回来过。而晏荣华仍然孑然一身，常年栖身在这一家的牛棚里，与牛为伴。后来回到老家晏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寄住在其伯父晏梓臣家，为人打零工、短工，出卖劳力。由于他勤劳、努力，生活才慢慢好转起来，娶妻生育儿女，到 1949 年政权易帜时，由于他苦苦挣扎，购置有二亩多田产，土改时被划为下中农。他是典型的不与人争、老实巴交的农民。

二、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家业，并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但不善于持家，不善于治理家业。宴谷丰、宴楚臣比较典型。宴谷丰之父荣四爹，民国时期在新疆莎车县政府民政科任科长，每年都寄钱回家接济家庭，还为其购置田产和在岳阳买了店铺，由宴谷丰经营。但

他不善于谋划、经营和管理，坐吃山也空，败落成了贫农。宴楚臣原在村中开有店铺，并购买有田产，生活殷实，由于日寇侵犯货源枯竭，又经营管理不善，加之人口多，直接参与劳动的人不多，慢慢家境败落。

三、瘟疫流行，天灾人祸不断，遭受灾难而败落的人家不少。听老人们说，1931年至1949年，我们这个村子先后发生干旱、天花、霍乱、洪水泛滥，日本人侵略者杀人放火，国民党政府打内战抽壮丁等，给农民带来灾难。1931年夏季发生旱灾，69天没有下雨，禾苗干枯，许多人家颗粒无收，有外逃的，有饿死的。1934年至1936年先后发生霍乱、天花死了70多人。1937年夏秋间，正当稻谷成熟收割时，又发生洪涝灾害，造成大面积的减产歉收。1938年秋至1944年日寇三次进攻长沙，其东线敌军三次经过我们村子，奸掳烧杀，杀死很多人，有的全家杀绝，民房70%被烧毁，有的人家的房屋，鬼子烧毁了，农民又重新修复，历经三次。1939年春又发生天花病，儿童死亡七八人。1946年至1949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而抓壮丁，家庭有青壮年的男儿，二丁抽一丁，三丁抽二，五丁抽三丁，男劳力抽去当兵当炮灰。到1949年解放时为止的十多年间，一个有100多户、700多人口的村子，剩下80多户，500多口人。这样的天灾人祸，造成农民苦不堪言，穷上加穷。

四、人祸遭致家破人亡。晏兴元的家原有祖父母、父母、叔叔、姐姐和他八口人，全家有三个半劳力，生活比较殷实。其父晏寅初1929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之后，灾难接踵而至。因其父参加红军，其祖父被国民党抓去审问，死于狱中。其父晏寅初参加红军后，由战士升任为班长、排长，并加入共产党，后在红军肃反运动中，他与堂弟晏丹香被当成AB团成员，其堂弟逃出，他于1931年10月在江西省兴国县东固地区被枪杀，当年还不满21岁。晏寅初死后，其妻改嫁，6岁的女儿晏仙梅被送到附近的伞把桥村当童养媳，一岁的儿子晏兴元由其祖母带着到处乞讨。后我的父母腾出两间房子给她祖孙二人居住，1945年8月正是日寇投降那一年，其祖母贫病交加忧郁地离开人世。晏兴元在晏寅初参加红军时还未出生，出生后由祖母抚养，孤苦度日，家庭一贫如洗，孤身一人，直到1949年新政权成立。

五、劳力单薄，母子孤苦度日，宴文成的父亲晏兴田早年去世，留下妻子和一对年幼的儿女，后来一岁的妹妹宴文秋身患天花夭折，十一二岁的宴文成与其母靠父亲留下的二亩田产艰难度日，到1949年解放时已有二十四五岁的他尚未找到老婆（本地习俗，男儿到十五六岁就娶亲结婚，到了20岁或20多岁的人，还未结婚，一是穷，二是没有本事的人），家庭穷困潦倒，母子艰难度日。

六、一生勤劳俭朴，不得温饱。本村的裁缝晏仲篪、晏宏清，篾匠晏兴加、晏裕慈等人，虽都有手工艺技术、生存的本事，但在那封闭的农村，也只能苦苦挣扎，勉强能维持家人生活，土改时定为贫农。

七、好吃懒做弄穷的。宴金华的父亲宴玉瑞是个木匠，为人精明能干，为儿子宴金华娶了媳妇，一家三口不愁吃，不愁穿，可是宴金华不争气，他倚仗父亲的手工艺，自己却不好好劳动，其父病亡后，在家里闲散浪荡，当打短工挣来的钱，不顾家庭，却到村中的小店喝酒，自甘堕落，土改中定为贫农。

还可列举出二三种类型的人家出来。

上述我们村子的情况，有一定的典型和代表性，但还是不全面。就全国其他地方农村贫困的人家中，除上述七八类的贫困人家中的人以外，还有一些游手好闲，不事劳动，有劣迹，作恶多端，人民厌恶的村霸、地痞、流氓、下三滥之类的人物，他们看到土地改革运动，将给他们带来好处，家庭受益，他们欣喜若狂，雀跃欢呼。在土改中，在合法的运动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胡作非为，大搞借机报复，以循私情；有的趁着土改中斗地主，斗恶霸的风浪兴风作浪，对被斗争的对象，滥施刑罚，捆绑吊打，乱打乱杀，打死人是他们挑头的；干扰破坏政策的是他们；煽阴风点鬼火的是他们；侵犯中农利益的是他们；等等，这些人是农村的渣滓，是破坏力量，是害群之马，可是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党的基层组织许多都把他們当成革命依靠对象，为了政治需要，执政者可以制造出这样那样的理论，以使其政策顺理成章，得以推行。执政者需要这些人斗倒地主，分田分地给农民，以取得农民的支持，支持这个政权，以图长治久安。可是用牺牲、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换取

一些人的拥护、爱戴，借以巩固其政权，说到底这是一种手段，是夺取政权的执政者的手段，是政治需要。农民分得了土地，又搞大集体，剥夺其土地，实际成了国有土地。国有土地、资源实际由权贵集团控制、使用，也是需要。这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

我家所在村子和我接触、了解的冤情

1) 晏仲衡、晏容初、谢仲儒、彭仲儒之死

晏仲衡，与我同一村人，土改中定为地主，其土地、房屋没收。原因是，抗日前当过两年保长，抗日时期，岳阳专署的抗日游击大队长胡昆率领的游击队驻在公田镇和我们这个村子，胡昆与其家属居住在他家。1949年7月，胡昆率部队向解放军投诚，后遣散回原籍岳阳县康王乡，1950年他率旧部二三人杀害康王乡多名干部后潜逃，潜逃途中在晏仲衡家住过，公田区政府以窝藏反革命罪，知情不报，将其抓获，决定处决，他得知后，自缢身亡。

晏容初，晏仲衡之子，做扁挑商品买卖，积累了一些钱，购买了几亩田，出租了部分，对其父被抓和其死亡有看法，说过一些不满的话，1951年土改中定为反动富农，交群众监督改造，其出租的土地被没收，经常接受批判、斗争，捆绑吊打和游乡示众，因不堪侮辱虐待，被逼自杀身亡。

谢仲儒，本地公田乡长安村人，北洋军阀时期，在岳阳县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当过一段小职员，后一直赋闲在家，靠出租的十多亩田产收取租粮维生，有一定文化，是长安村的绅士，在谢姓族内有一定威望与影响，深受村民爱戴。土改中执政者和土改工作组查不出其劣迹与罪证，便从矮子里挑长子，给他安个“恶霸地主兼土豪劣绅”，1951年枪杀，至今，当地人民怀念他。

彭仲儒，公田乡彭昌利人，私塾教师，以教书为职，教了一辈子的书。在我们村教过几年书，积累了一些钱，购买了一些土地出租，土改中划为地主。在批斗他的大会上，追逼其交出浮财，刑讯逼供，吊打致死。

谢克荣，本地长安村人，中医师，开设有中药房、杂货店、豆豉房，积累了一些资金，先后购买了28亩田产，其中一些田产由其第三子谢孟州耕种，其余出租，1948年去世。其家务全由他掌管、操持，他的妻子吴玉珍有病，根本就没有管过家。1951年土改时，因为谢克荣于前二年死亡，硬将其妻吴玉珍定为地主分子，拉她去批斗时因有病，就由被划为贫农的第三子谢孟州代替接受斗争。其第四子谢松州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因在岳阳县城与人合伙投资开设了一家杂货店，雇有二个店员，一个厨师，1955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公私合营”，被定为资本家，资产、店铺、住房没收，曾接受批斗，追逼他隐瞒了的资产。

2) 邹建政的悲剧

邹建政，湖南叙浦县人，是我与其相处交往48年的朋友邹国华的父亲。2010年12月4日，我和我的老伴前往北京望京北路，去拜访看望老朋友汤有伦、邹国华夫妇，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闲谈中，邹国华同志对我们谈起了她父亲的经历。

邹建政一家人原居住在叙浦县横岩村，他的叔父邹世忠是早年中国共产党人，向警予的中学老师，一直支持向警予、向达等人从事革命活动。为了更好的创造条件，给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提供方便，邹世忠便要其侄邹建政全家搬到叙浦县城居住。邹建政全家迁到县城之后，叔侄二人在叙浦县城的二街集资开了一家饭馆，既为家庭，也为地下工作者筹资金，并将开设的饭馆，变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从事活动的联络、接头点，又是地下工作者的接待站。从19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一直为其提供支持与方便。新政权建立后，叙浦人民人所共知。

邹建政的老家横岩村，原有4亩田，他的一位婶婶独自一人，且身患重病，全由邹建政家人照料，请医生医治，欠了不少债。后婶母病亡，其婶母留下遗言，将她仅有的8亩田传给其侄邹建政，作为付还欠债和安葬她之用。这样邹建政家原有4亩田，加上婶母的8亩田共12亩，因为全家已迁至叙浦县城，这些田只得出租。1951年土改时，他家被定为地主成分，他被定为地主分子。他与他的叔父为共产党地下党活动提供的支持与方便，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土改中将其全家威逼又搬回横岩村的老家，对邹建政进行批斗吊打，威逼其交出浮财，用尽刑讯逼供手段，无人制止，邹建政遭致一身残疾。

平时，邹建政与人闲聊中谈到，他在1920年代曾见到过汪精卫。这一敏感话题，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到了1957、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和文革时期，人们总要拿他见到大汉奸汪精卫说事，对其批斗、吊打，当成家常便饭，令其交待汉奸问题和罪行。这是这个时代人们惯用的逻辑思维：“汪精卫是汉奸，见过汪精卫的人也是汉奸”。邹建政自土改中划定地主分子之后，没有过过安静的日子，他与其妻生活艰难，靠三个女儿生活上支持一些。1979年初，在当代人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的大潮流下，他被摘掉了地主分子帽子，还他以公民权利。这时他才直起腰来做人。当年10月2日，他与老伴从叙浦县横岩村乘车，投靠在武汉市工作的大女儿邹志华家。在女儿邹志华家安详、平和地度过了15天，于10月17日与世长辞，终年79岁。

3) 郭官傅一家的灾难

郭官傅，岳阳县公田镇园门郭家村人，1942年2月至1949年7月，任岳阳县一心乡（后改为甘田乡）高级小学教师。我是该校他的学生。抗日时的1938年11月，他随其家庭逃避日寇，逃到湖南安化县，并在安化县立中学学习，集体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该校中学毕业后，与同班同学肖风英结婚，1941年冬迁回原籍。他本人和全家靠教书收入为生，1951年土改时，追查其三青团骨干，他说，他是集体加入的，是一般成员，自加入以后和

迁回岳阳县老家之后，从未活动过，其三青团组织关系也未转到岳阳县来。就此，定他为“反动地主兼反革命”罪名，予以逮捕。1951年5月，从他的家里押解到公田乡，途经我们宴家冲时，因为我们村子有五六人曾是他的学生，他大声叫喊：“我不是反动地主，不是反革命，我是冤枉的，我一直在教书，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政府要调查清楚啊！”当时的宴家冲有多人听到他的这些话语，我们村子有一位名宴湘屏的，是他最欣赏、爱戴的学生，就亲自告诉我这一情节。后押解到乡政府驻在地长安桥，不久就枪杀了。在枪杀他的现场，他还大声呐喊：“不要打死我，不要打死我！”一边呼喊，一边跑，求生的欲望多么强烈啊！子弹是无情的，持枪者一阵乱枪扫射，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郭家是个大家庭，其父兄均在外地，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家人中有在中国驻瑞士、法国等大使馆的外交官，老家有田产出租，土改时被划为大地主，田地、房屋没收，扫地出门。他被枪杀后，其妻肖风英带着八岁的女儿郭光玲，三岁的儿子郭永祥，住在分给她家的一间偏房里，生活无以为继，她为人做针线活，做布鞋、纺纱等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后来实在生活不下去时，还带着孩子外出讨饭，有时有人劝她改嫁，她不动心，苦苦挣扎了几年，儿女慢慢成长，因父亲的身份不能入校学习，为了儿女的前途，不得以改嫁到远离家乡80里外的岳阳县麻塘乡一户农民家。开始，这位农民还挺喜欢她，因为她有几分姿色，又有文化，为人精明能干、贤惠，对丈夫体贴入微。可是日子长了，一家添了三口吃饭的人，左邻右舍说闲话的人多了起来，又慢慢地知道了她家原来的一些情况，说她是地主、反革命家属等等，闲言碎语向她袭来，在村子里流传开来。这时丈夫也慢慢嫌弃她起来，到了后来逐渐发展到打骂她和她的儿女了。她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任丈夫侮辱谩骂、殴打，总是不吭声，只埋头苦干，操持家务，服侍丈夫，和起早贪黑地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增加家庭收入。就是这样，她拼死拼活地操劳，丈夫还是不领情，不怜惜她，反而打骂虐待加重了，还声言要将她们母子三人赶走。肖风英在走投无路，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服农药自杀身亡了，丢下两个可怜的儿女。

郭光玲、郭永祥两姐弟土改后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人们不得而知。有时我回老家，从族兄弟晏乐龄、晏湘屏处谈起来听到一些。2001年8月我回老家时，他们姐弟知道我回来了，便来找我，向我诉说了他们父母的遭遇，特别是父亲的冤枉，和母亲的苦难。他们姐弟哭着、说着，我们三人都成了泪人，泣不成声。就我所知道、了解的政策，向他们做了介绍，和怎样为其父亲的冤案申诉，指了一些路子，出了一些点子，还带他们到岳阳市找了一些了解他父亲案情的人，要他们找县法院或公安机关。后来听说，县政法机关为郭官傅的案件，作了纠正昭雪。

郭官傅、萧凤英夫妇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了他们为了求生存、奋斗的人生世界，人死了，还能复活吗？平反、昭雪又有何用？能将他们从死里拉回来吗？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为什么有人如此罔顾他人生命，践踏他人人权呢？谁给他们这种权利？不值得人们深思吗？人权何在，法律何在？

4) 方珊华一家的坎坷道路

方珊华是我堂弟晏双阳的妻子。她的老家原在湖南岳阳县云山乡方家湾，祖母彭氏，是本县公田镇向阳村人，是一个大富户人家。家庭成员中于清朝年间，分别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当官，积蓄有一定家产。珊华的祖父是一位读书人，其祖母与祖父于1890年代结婚时，彭家将在本县熊市乡界岭村一处有二三十亩田产的庄田，作为陪嫁的嫁妆，给彭氏带到方家。珊华的父亲方景伯于1900年出生，一生为人老实本分，其母陪嫁的庄田就由他来代管。举家搬到界岭，其田产只能部分租种给人家。日本侵略者侵占岳阳县达七年之久，处于被日寇沦陷的岳阳，租种他家田地的佃户，则很少交纳过租谷（包括现金）。

1945年日寇投降后，方景伯先生全家又迁到岳阳县城，在岳阳县城的梅溪桥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经营油盐酱醋、烟丝、草纸等杂货，由他和其第二子方荃寿经营。日寇沦陷岳阳城七年，农村田地荒芜，城乡经济萧条、凋敝，货源缺乏。方景伯父子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复兴，他们父子的艰难创业，铺面由20来平方米，逐渐扩展到50

平方米，于1948年与四人合资，在先锋路正式挂牌为“东方杂货店”，资金约有当时的法币几万元，雇有二个学徒，一个厨师。其中的一个学徒就是我的堂弟晏双阳，他时年十多岁。我的这位堂弟家庭贫穷，全家人靠父兄为人补锅、宰杀牲畜维生，家无住房，住在他们村东头的天嶽观的一间破庙里栖身。双阳上过几年私塾，他为人好学，精明、机灵。本村晏畅明先生于1948年，介绍他到方景伯先生的店铺里当学徒，深得方先生父子的赏识。

1950年冬至1951年春，岳阳县农村全面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彭氏陪嫁到方家在岳阳县熊市乡界岭村的二三十亩田产，则成了其子方景伯的累赘，方景伯先生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其田产、房屋全部没收，扫地出门。这时方先生全家已在岳阳县城，土改开始后，他已听到土改中斗地主的种种恐怖、暴力行为，有的地主在斗争中被打死打残。不久，熊市乡政府就派了两个民兵来抓他回去斗争，他因害怕自缢身亡，终年51岁。

方先生在岳阳县城先锋路口的东方杂货店，是股份制，由四家人出资合股经营，全部资产几万元，约合现在人民币几十万元，到1956年新政权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搞“公私合营”时，将方家和其他三股东划定为“资本家成份”，名为“公私合营”，实际将他们的店铺的资产、房屋全部没收充公，每月给方家等四家每家“定息”6元，还称这个“定息”是“剥削”。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几元“定息”也取消了。

方珊华的大哥方祥福，1949年前，在粤汉铁路上工作。二哥方荃寿帮助父亲经营小商店，其家庭生活由小康水平，经过几年的变故与折腾，已落到赤贫地步。其父早已离开人世，他们兄妹考虑到，为了使家人平安地生活，不致再遭来灾难，便寻求保护伞，看准了我的这位堂弟双阳为人精明、厚道，家庭出身好，所以将珊华许配给双阳，借避风港，寻求保护。双阳、珊华是1958年夏结婚的。那时正是珊华从湖南衡阳铁路中学高中毕业，那年8月初，我正从下放劳动的河北省南皮县农村回岳阳探视我父母，在岳阳见到了他们。

方珊华在衡阳铁路中学毕业时成绩优良，门门功课4分、5分左右（当时的计分制：满分为“5”分），本可进入较好的大学，校方按衡阳市教育局根据上边“政审”规定，“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或有杀、关、管和其它劣迹成员家庭的学生，一律不允

许升学”，又碍于珊华的大哥方祥福是铁路职工，这样才将她分配到衡阳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习，这个系毕业的学生，一般被分配到农村从事乡村卫生工作，珊华没去这个学校，后不得不入湖南省轻工业学校。1960年代初，获大专毕业后，将她分配到岳阳县自来水公司，工作岗位是在岳阳县城观音阁街道自来水站售水，开水龙头为居民售自来水。直到1970年代，经双阳为其多方申辩，才为她由工人转为干部，这就是那个年代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贱民”的命运。

5) 晏仓舟一家

晏仓舟，是我们村子周围几十里有名的中医师，家里开设有中药铺。他医术高明，为人和善，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一些有病无钱治病的贫苦农民，他一旦发现，便主动上门诊治，送医送药不收钱。他家原在我们村子居住，后在东边一里外的桑园坡修建了几间房屋，并在附近购买了20多亩田产出租，家庭殷实，算是小康之家。他与其妻姜氏生育三女一子，均送他们上学，有一定文化。

1927—1930年，共产党在我们那一带农村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时，他的家庭受到冲击，红军曾将他十三、四岁的儿子晏拔奇抓去扣押作为人质，让他睡在潮湿的地上，为了防止晏拔奇逃跑，用打稻谷的禾桶罩住他的身子，然后令晏仓舟用金钱将其子赎回。他的堂弟晏成在出面找红军交涉，不得已他卖掉八九亩稻田，凑成2000枚银元，将其赎回。可是红军头领嫌钱少，声明要3000银元才能将其子放回，否则要将其子杀害。晏仓舟为了将其唯一传宗接代的儿子赎回，又卖掉几亩田产，凑足了3000银元才将其子赎回。放回时，由红军团一级的单位，开具了3000银元的借条（盖有团部的印章），交晏成在带回。①

晏拔奇被红军扣押了半个多月，日夜躺在潮湿的地上，从此身体瘫痪不能劳动，而晏仓舟于1936年，忧郁地离开人世，家庭也慢慢败落下来。其子晏拔奇一直病魔缠身，1948年离开人世，终年三十四岁。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当年红军放回宴仓舟之子开具的3000银元的借条早已遗失,也就无法向新中国的政府索还“借款”了。¹

1950年冬,我们的家乡开始土地改革,他家还剩下八九亩田产,开始他家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1951年冬土改复查时,又补划为“破落地主”,田地、房屋被没收,晏拔奇的妻子彭月娥带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生活无以为继。

晏仓舟的大女婿周谦伯,是本地周兴铺人,原是国民政府岳阳县盐务局职员,1949年政权易帜时被留任。他为人和善,忠厚老实,1955年内部清理,肃反运动中受审查,威逼他交代历史问题,他说他在参加新政权工作时,就已交代清楚了自己的政治历史。审查他的组织和人员说他不老实,对其搞刑讯逼供,轮番斗争,他支撑不住,跳洞庭湖自杀身亡,其遗体都未找到,只在《岳阳楼》下的湖边找到他的一只鞋。他的大儿子周代江,原是中共地下党员,从事民运和情报工作,1949年以来在岳阳县公安局工作,由于其父周谦伯的事受株连,调岳阳专署农机局,一直不受重用。

晏仓舟的三女晏礼雍,1943年起就在我们晏家冲小学教书至1958年。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公田乡政府和岳阳县教育局号召、动员教职员工“帮助党和领导整风提意见”,她在动员会上,就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和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在会议上提了一些建议与看法,当场得到该小学校长彭完全的赞赏,说:“提得好,挺有创新精神”。可是到了1958年反右运动补课,有人说她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便将她在整风运动初期提的建议与意见重新翻腾出来,结果,晏礼雍被补划为右派,开除教师队伍。其丈夫江剑云,在本地公田乡小学教书,受株连,以“退职处理”,连同他们的三个儿子共五人,取消国家粮食供应,到她所在的生产队落户。

1958年8月,我正被公安部下放到河北省南皮县农村劳动时,请假回老家看望父母,回到家里,我于8月12日下午专程到桑园坡去拜访过她。晏礼雍是我的小学老师,是我的长辈,我称呼她为姑妈。见到她时,我们姑侄悲喜交加。当时她心情忧郁、沉重,当我问

¹ 1993年3月4日,晏仓舟的二女儿晏凡英在北京儿子的住所,亲自对我讲述。

起她的家世、父兄、姐姐以及她本人的情况，她对我谈起了上面的这些情况与遭遇，说着说着，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当我谈到我的遭遇时，我们姑侄俩同受那个时代的打击，同病相连，都同声痛哭起来，成了泪人。她的妈妈受我们的感动，也同我们哭了起来，三人哭成一团。不久我便离开家乡返回劳动的地方。

晏礼雍全家人遭此灾难之后，生活无着，她曾以为人手工缝制衣服维生。1962年至1963年还到湖北监利县薛潭公社刘家墩生产大队我二哥晏碧溪家住宿，走村串户，为人缝制衣服。1975年夏，她抑郁而亡，丢下了三个儿子和丈夫，撒手人间，终年52岁。

1970年代后期，共产党的健康力量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我20多年的冤枉得以纠正、平反，落实政策。调回公安部之后，1980年我回老家岳阳，曾去找岳阳县文教系统的党组织，为晏礼雍冤案进行申诉。中共岳阳县委宣传部为晏礼雍一案进行了认真复查，为她和她受株连的丈夫江剑云长达23年的冤案进行了改正、昭雪，恢复名誉，对江剑云作为退休对待，并为他们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他们一家三代背着的黑锅，才重见天日。

6) 陈洪达悲惨的一家

陈洪达（化名），是我湖滨中学高中部同学陈晓光（化名）的父亲，其父从小为一富户人家放牛，后在这一家当长工8年，1924年到岳阳县城一家西餐馆打工，慢慢学会了做西餐、西点，1932年到县城美国基督教传教的惠施霖（起用中文姓名）牧师等传教士当厨师，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们离开我国，返回美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惠施霖牧师的儿子惠×××携妻子来到我国，夫妻在我们湖滨中学教授英语课。而陈洪达又为惠施霖牧师的儿子一家当厨师。陈洪达前后为惠牧师等和其家人当厨师多年，积累了一些钱，便在老家购买了七八亩田出租，1951年当地土地改革时，陈洪达被划为地主、洋奴，威逼他交出“浮财”，和“帝国主义分子如何欺压中国人”等，并追逼他“交代特务问题”。一个为外国人当厨师的佣人又怎么变成了“特务”，对他进行捆绑吊打，

折磨了三四个月，最后被活活打死。我这位同学的母亲也当成地主分子批斗、吊打，被打断两根肋骨，丈夫被打死后，孤身一人，身有残疾，在家艰难度日，靠其唯一的亲人——儿子陈晓光寄钱维持生计，后不得不投靠其子。文革初被遣送回乡，不久病魔缠身死亡。

我的这位同学，其生身父母生下他三个月，父母离异，抛弃他，由陈洪达、王氏抚育成长，送他上学到高中，1950年12月，抗美援朝时，他与我同时报名参军，他分在空军，尽管他在部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埋头工作，因其家庭出身的关系，不久转业到一家工厂工作，在政治运动中没有逃过劫难。多次被隔离、审查批斗。

我与陈晓光同学已分别61年，是近几年联系上的，他的身世与家庭遭遇是他断断续续告诉我的。今年12月31日他打来电话，说他身患绝症，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在电话上一边哭泣，一边诉说他一家的不幸遭遇，他说在他离开人世之前有四个遗憾：

- 一、没能看到揭露、批判毛泽东的错误的到来；
- 二、没有看到我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过上自由民主生活的一天；
- 三、没有对他的再生父母尽到赡养、孝敬的义务，对不起他们；
- 四、没有给妻子、儿女带来幸福、安康，带来的是政治上的灾难，对不起他们。

下午我将这一情况告诉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他对我谈起了一件往事。1983年他回老家去看望已80多岁的父亲，其父当着他和他两个弟弟说：“我这一生没有给你们带来幸福，带来的是灾难。1、给你们兄弟一人一顶帽子（富农分子家庭出身）；2、在我离开人世时，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我这里用竹子编了三个筐送你们去讨饭用；3、我死后，不要聚亲友为我发丧，更不要用绳索捆绑棺材让我难受（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其父常被揪斗，用绳索捆绑吊打他）。丁明清同志对我讲述时心情沉重，我也难过。

人类进入到20世纪现代文明民主社会，为什么夺取权力的执政者对另一部分人采取如此极端手段进行迫害、摧残和杀戮？！■

【无达诂】

调寄《山坡羊》：为流文人画像

烏紮拉

一

今日如豬，昔日似鼠；
由鼠變豬誰做主？
讀書人，毛焉附？
洗罷腦筋大鍋煮。
嘴上了嚼子頭上了箍。
生，心為奴；
死，魂為僕。

二

當年老九，當下犬儒；
梁效、江天白受了辱。
文史哲，中藥鋪，
售與官家壯陽術；
著書立說都為了祿。
老，也媚骨，
少，也媚骨。

農曆甲午年仲秋，於北京之北

【文摘】

文革前“老三届”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马昌海

通常所说的“老三届”，是指本应于1966—1968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出生于1947—1952年间，1963—1965年进初中或高中学习。他们是在新中国的红旗旗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前辈英雄业绩的感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领袖，热爱社会主义，很多人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革命责任，富于自我牺牲精神。

另一方面，由于文革前的青年人基本不了解外部世界的状况，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也给这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带来了致命的弱点，其中的一些人在文革之初甚至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而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类似希特勒第三帝国纳粹少年冲锋队一般的人？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6年8~9两个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双唇鲜艳如樱桃一般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活活打死；与此同时，北京女三中校长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学生打死，就此开启了暴力的酷烈大门。这场从革命开始的运动，最终升温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鲤”，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裸体地长时间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自食其果）。“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年仅14岁，原本没有打人的资格的陈凯歌，在从众心态的驱使下，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为了向别人证明自

己是“自己人”，为了摆脱孤独的恐惧感，于是打了人。他打的第一个人正是自己在批斗会上的父亲，却博得了众人的喝彩！作家老鬼（马清波）在其自传中也真诚坦率地描述了自己对家庭、对两个姐姐特别是对其母亲——著名作家杨沫（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的造反行为。当年北京47中的初三学生老鬼忏悔道：“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更有甚者，还有儿女褻渎父母、坚决不给冤死的父母收尸，儿女还要上前踢父母尸身几脚等触目惊心、丧尽人伦的可怕情景。这些家庭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其范围之广、创痛之巨，为亘古未有。它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一个主题。

过度的政治化不仅制造了各种运动被整者的巨大群体，还使他们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只要你家里有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无论家庭解体与否，你的家庭就会被污名化，其家庭成员，配偶和子女就要被迫与其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要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文革的极度政治化将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在运动中被整的对象，其家庭成员，配偶和子女被要求必须和其划清界限。划清界限的具体标准是：一是要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仇讎，上纲上线批判。在那个愚昧、荒唐、悲惨的年代里，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

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说：那些知青作家，“他们都写出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是怎样变成了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到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见《黄河》1998年第5期）。

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一些红卫兵不仅打校长、老师，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还打自己的同学，而且下手十分狠毒。有的人还到各机关、学校、企事

业单位和居民区去轮番打人，甚至跑到农村去殴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份子”。在1966年的“红八月”，王府井吉祥戏院甚至设立了一个专门打人的群殴集会，一些中学生天天聚集在那里打人。从北京市各处被送到那里的“牛鬼蛇神”们，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许多人死于非命。行凶者尤其凶悍的，是一群女生，自恃血统高贵，便剃光头出言污秽，下手狠毒。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将手指伸进一个地主婆口中用力撕扯，因为对方拒绝呻吟，反倒使女孩陷于歇斯底里的狂怒状态，手上沾满了受害人的鲜血。他（她）们在北京火车站外几百米一字排开，站两行，手持皮带、木棒等凶器，抄家之后被逼离京返回原籍的“剥削阶级们”，在进入车站之前须首先在这两条长龙之间通过，作为回乡的洗礼。北京六中更建起监狱，尽夜拷打，刑罚名目之多，暴行之烈，冠绝一时。他们蘸着牺牲者的鲜血在墙上写下了“红色恐怖万岁”。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导演陈凯歌回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乃至杀害，使我在20年后犹自震惊而百思不得其解。”当打人和暴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光荣、一种仪式、一种特权的时候，对这些施暴者所受的教育是有必要认真反思的。

这一代“老三届”（1966—1968）中学生是文革前思想政治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狂热、偏执、狭隘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并在文革中以夸大、扭曲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全社会都要来抓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后，共产主义价值

体系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1957年反右派斗争及而后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左”的指导思想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开始以后，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为标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左”的倾向开始有了一些调整，在“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教育的基础上贯彻了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提出“向科学进军”；在德育工作中既重视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榜样教育、劳动实践，又加强了以学生守则为中心的道德品质教育。在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校内各教育阵地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校外教育，并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在此前后，“老三届”学生陆续进入中学就读。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再次产生了“左”的影响，1964年，以毛泽东就教育问题的“春节谈话”为始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对教育改革虽有积极意义，但也包含了不少极“左”的因素。随着中苏分裂和美国采取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日益重视“反修防修”，教育领域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同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更强化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阶级斗争意识。1964年7、8月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以后，阶级斗争教育成为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伴随着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搞“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逐渐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当时的教育方针，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经过建国以后十几年的实践，这种教育日渐系统和完备。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还有听报告，上团课，参观，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革命军人）做忆苦思甜和英雄事迹报告，访贫问苦、“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开展“四史”（村史、社史、厂史、家史）教育，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还有许多歌颂党和毛主席，赞颂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回忆录以及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美术等文艺作品。青年学生从小就受到革命和建设者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像英雄那样的生活，为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青年学生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 and 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青年学生所在的学校、班级，少先队的中队、小队，团支部、团小组，都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于集体的纪律。于是，万事依靠集体、服从集体，唯恐被集体所不容，甚至时时担心被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所具有的鲜明特征。正如一位女知青作家所说的：“我们失去了个性，我们变成了群体，一片忠诚不二。我们的幸福观、理想观、是非观失去了一切个性特征，这就是毛泽东的孩子们最统一的素质”（见张蔓菱：《并非丑陋的一代》）。还有人这样评论：“这一代人的社会化，已经无可挽回地朝着团队精神的方向演进，他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同自己一代人的命运相关联。一代人的命运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一代人的缺陷就是一个人的缺陷。作为个人，这种定向的社会化过程留给他们发展独立人格的余地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们自己在今天都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他们为成长所付出的代价（见张永杰：《成长与代价》。以上均载于《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为什么文革初期“出窝黄蜂的第一群是青年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友渔、定宜庄、刘晓萌，《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李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东成等人对此都有过精辟地分析。一些当事人描述文革前对中学生的思想训练，革命理想高于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高于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利的人生观教育，使中学生们“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

我们儿时曾唱过这样的歌：“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做革命的接班人。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革命的火炬，照耀我们前进的路程；红色的后代，从小培养革命的精神。学黄继光那样勇敢，学刘胡兰那样忠诚，学刘文学那样坚强，学雷锋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爱祖国爱人民是我们的责任，爱学习爱劳动是我们的本分。前进吧，小伙伴们，前进吧，革命的接班人。祖国万里河山在等着我们，世界革命人民在

期望着我们。前进吧，革命的接班人。祖国万里河山在等着我们，世界革命人民在期望着我们！”唱到最后一句，往往使我们不禁热血沸腾。忠于党和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富于献身精神，渴望为革命建功立业，不怕流血牺牲，认真负责、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组织纪律性强，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渐渐在一代人身上成为了现实，“被铸进了剑身”——这就是许多亲历者所说的，为文革做好了准备，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文革前各类学校都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也从文艺界延伸到教育领域。1963年10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强调要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指出阶级的爱、革命的爱和对领袖的爱绝对要高于亲情和师生、同学之间的爱，并且把人性爱的教育扭曲成了仇恨教育。一年之后，《人民教育》围绕这次“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是渺小的，而绝不是什么伟大的。”在这样的一种教育氛围中，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开始形成日后红卫兵缺乏人性的情感模式：无情被视为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念形成之后，他们便满怀对革命的渴望和“砸烂旧世界”的豪情壮志及建立新世界的崇高理想，顺理成章地走向了文革造反的前列。当初这些人，几乎没有（起码在我的视野里）是拒绝走进文革的，或者是内心有很大的抵触的。文革对于青少年来说，不管是初中学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迎来了一个自己的节日。整个学校、社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来说是极其枯燥压抑的。所有处在当时那样一种状况下的青年学生，今天如果如实地扪心自问，当最高统帅一声令下，说可以不上学了，你可以上街了，你可以去北京、上海，海南岛，这样的一种痛快淋漓的解放感是前所未有的。

文革前青年学生的头脑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崇拜”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涵：①它确定了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②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③鄙视人权、人性和个性自由，个人必须绝对服从整体利益。④颂扬暴力、鄙视温和改良与妥协。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的象征。⑥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晚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绝对真

理。⑦普遍缺乏民主与法制的观念。⑧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全人类是我们青年一代神圣的历史使命。

请看当年我们这一代诗人郭路生（食指）书写的一首著名的反理性的义和团情结诗篇：《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为世界上仇华分子提供了又一个“黄祸论”的依据。

文革使人性中最卑劣、最丑恶的一面恶性膨胀。这其中的渊源除了社会、历史、文化因子外，在革命队伍内部，我想从近处起码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三十年代的苏区“肃反”扩大化。当年夏曦、张国涛等红军将领手下的“肃反”干将们，不少都显露出这种丑恶的面目。以后又经过多次的党内斗争（如“抢救失足者”运动，再经过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到文革时发展到极致）。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行径、表面上是从斯大林的“肃反”移植而来，其实还加上了富于中国特色的“国粹”（流氓无产者习气）。

顾准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指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了一种宗教现象，这种宗教现象在文革中达到顶峰。一些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与这种个人迷信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代人的忠诚实际上是一种盲从，是在缺乏先进观念和相关知识的前提下，丧失了正常的思考和判断力的结果。罗点点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如果当年有人告诉我们：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的责任是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独立思考，是怀疑和批判精神。这肯定会被当作大逆不道。推行盲从教育，使每个人忘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首先是歌颂领袖的绝对正确，同时也是要求人们彻底忘掉和抹杀自我，绝对顺从。就同一种族和传统而言，红卫兵运动与19世纪末的义和团有相似之处：同样地狂热和盲从。尤其他们都认为自己掌握了某种咒符而战无不胜，并且都盲目排外，在使馆区闹事，毫无法制观念。义和团的农民是因为无知而被满清皇室所利用，而红卫兵则恰恰是因为受了教育而造反（见徐友渔：《造反之理》，《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12）。这种对党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集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人满怀崇高的理想主义并满腔热情地投入文革，并在文革中成为冲锋

陷阵急先锋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他们而后被大批送往农村插队时，仍然能够听从召唤并服从安排的原因。总之，对于文革中红卫兵由于狂热、愚昧而对整个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害，文革前的17年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谁也无法否认：文革之初红卫兵的出现并非突然，他们正是文革前17年教育的结果，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这种教育使被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他们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他们整天高喊着大批判，却对是非缺乏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对一切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少数思想探索者除外）。他们所使用的批判标准只是毛主席语录，而不是实践和真理。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而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他们批判过“不好不坏、浑浑噩噩”的“中间人物”文学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同志就要“高、大、全”，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即便是他的师长、同学、亲友，甚至亲生父母，也是敌人，由此便发展出了偏执。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这种教育只教他们去仇恨、去打倒。于是他们认为：只要是对敌人，无论怎样残忍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他们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就是对革命和领袖的不忠。

正是这种缺乏科学内容的简单的仇恨教育，与忠诚盲从和个人迷信掺合在一起，除了培养出疾恶如仇的品质，“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地冷酷无情”，还驱使红卫兵们满怀深仇大恨，对眼前的“阶级敌人”做出种种惨无人道的行径，在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之后，反而获得了以折磨人为乐趣的快感。当然，新中国的阶级敌人并不限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国民党，叛徒、内奸、工贼、特务，还有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后来又加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由于先天教育的缺陷，这一代青年人的国学基础薄弱，批判封建主义使他们不懂传统文化，不知民族精神的家园在何方；他们对西学一知半解，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割断了他们

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难以融入世界文明的海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又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畸形的斯大林主义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红卫兵们，怎么可能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学的批判怀疑精神？盲从产生的原因是封闭环境下知识和精神的匮乏，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缺陷。教育本身是具有连续性的，这一代人的缺陷，正是上一代人教育的结果，结果是作为教育者的老师们首先尝到了这种教育的苦果。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亲密的伙伴，却不在意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人们只能热爱党和毛主席，还有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这是绝对高于亲情和友情的。至于同情、怜悯、温存、宽容大度，则一概被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属于被人唾弃之列。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全是政治标准，没有业务标准）来看，“接班人”并不是指一般的“革命青年”，而是指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的各级领导干部。有权或有条件搞“一言堂”的也只能是领导干部，普通老百姓恐怕只可能对自己的子女搞“家长制”，还不一定能奏效。一般的老百姓即便是自以为是，和地球转不转也没什么关系。虽然各行各业都有接班的问题，但在文革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接班”这两个字却是指政治上的接班，也就是被提拔当干部。在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先进典型可以出自于不同的家庭，而革命接班人却几乎只能从出身于“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青年中选拔。

“接班人”的首要标准是“反对修正主义”，这就必然将青年导向了阶级斗争的行列。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化教育，强调青年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在提出“接班人”教育后达到了高潮，培养接班人的活动与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思想行为关系极大。它的直接后果是将学生导向了政治目标，并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它还引发和强化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激烈竞争，当“革命青年”是没有名额限制的，而“接班

人”却只限于极少数出类拔萃之辈。革命青年是一种称号，而“接班人”却是一种政治地位（掌权者）。“老一辈革命家们自信自己已经建立了千年王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而下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放在哪里哪里亮”的驯服工具，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顾准先生曾问道：为什么播下了浪漫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千百万人为了之奋斗牺牲，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结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已被当代西方抛弃的斯巴达精神，确是苏俄和中国极“左”路线的重要文化支持。正是这种尚武的、平等人公社式的英雄集体主义，在革命胜利后形成了专制独裁的独特温床。对于历史上“教民耕战”以至实行“盐铁专卖”，手工业“国营”的中国，后来又集体英雄主义强调过头的中国，应该提倡和弘扬合理的“民主个人主义”。

罗点点以其父罗瑞卿所遭受的迫害为名，谴责人世间所有的暴力和恐怖，摈弃鲜血培养的花朵。对待毫无忏悔之心的恶人，难道还不应该以牙还牙，以血换血吗？！中国人缺少宗教忏悔的因子，那些当年有意无意作恶的人，没有多少出来忏悔。比如1966年8月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集体大屠杀的参与者们。张贤亮在其小说《青春期》（载《收获》1999.6）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其他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前些年《南方周末》开展以忏悔为主题的征文，只刊登了两三篇（其中有一篇是一位当年的北京女中学生，忏悔自己在文革之初曾剪了著名演员于是之的头发），就终止了。当年的打手、凶手们，有几个能“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呢？罗点点说：“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迫害至死。这是人类逃避法律责任最伟大的文字创造。”对当年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们无法无天、丧失理智的行为，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了。

前些年《南方周末》有篇回忆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遇罗克被害的长篇通讯，提到过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片警（户籍警察）。红卫兵抄家、打人，把人送进北京一中劳改队和北京六中监狱，或遣送回原籍，是谁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指示，向不知情的红卫兵们提供了具体而准确的住址和姓名？就是那些躲在一旁不吭声、不露面的片警！就如同查抄陈凯

歌家时，躲在一边的同院同学！不然红卫兵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素不相识的“坏人”？这些老户籍警们，如今已安度晚年，有多少人曾出面忏悔过自己当年的行径？红卫兵们之所以能够顺藤摸瓜、熟门熟路地四处抄家打人，这些片警们实在是功不可没。将来写文革史时，这是不可遗漏，不可磨灭的一笔。许多作家、学者、前辈在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又有多少曾被公之于众？文革是亿万中国人的集体作品，其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这些负有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满怀豪情壮志却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初期就这样成了一批只会进行丑恶地盲目破坏而不会从事新建设的亡命之徒和匆匆过客，事实上，到了红卫兵运动的中后期，许多人就已深陷于帮派斗争之中，嘴里说的是保卫毛主席，行动上却是在维护山头的利益和个人得失。于是，投机钻营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卖身投靠者亦有之。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不忠实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并非都是那么简单的上当受骗。有一些人对政治斗争日渐厌倦，当了“逍遥派”，游离于帮派的斗争之外，寄情于读书、养鱼、郊游和制作半导体收音机的乐趣之中。还有的人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甚至成群结伙，斗嘴置气、打架斗殴。此后，这些年轻的红卫兵便很快通过“上山下乡”而被融入了中国农村的汪洋大海之中。事实上，红卫兵性格决不仅仅只是属于那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它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一种体现。当年不正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及处世哲学，才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同时，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留，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后人。比如信仰危机、偶像崇拜，独立思考和批判怀疑精神、诚信道义良知和民主法制的缺失，对人权、人性和个性自由的冷漠和轻视，缺少宽容大度与同情之心等等。现今一些青年人缺少社会公德的现象，其粗暴无礼也很难说与红卫兵性格不无关联。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我们民族身上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来遮掩住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

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此次发表作者有修改。

【封面】

波普雷锋

这一创意来自本期《什么是红色文化》和《雷锋：政治图腾与积德行善》两篇文章。

雷锋头像是红色文化的标志，变换色彩的波普艺术代表流行文化和现代性。“波普雷锋”是红色文化与西方流行文化的联谊。雷锋从此有了多重文化属性。他跨越时空，贯通中西，打破无产阶级政治与资本主义商业的藩篱。将过去和现在，东方与西方，政治宣传与大众传播结为一体。■

——邹行

【读者来信】

1. 乔晞华谈《记忆》207期王复兴的文章

对王先生的观点我基本认同。其实我对“两个文革”的批评远远轻于对“一个文革”的批评。是小批评，大帮忙。有两点建议供王先生参考：

一、我赞同王先生对“人民的文革”定义：文革中，以群众造反派为主体的，以反迫害、要自由为利益为诉求的，以民主、人权、法制为最终目标的，脱离了“毛泽东文革”的宗旨、部署的相对独立的社会改革运动。如果能再加一句“通过体制外的手段”，似更符合社会运动理论对社会运动的定义。当年“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这一体现。

二、“毛文革”是纯粹的党的运动（英文叫 campaign），按社会运动学的观点，与民众的社会运动（英文叫 movement）是两码事。因为中文没有专门的词汇区分党的运动和民众的运动，所以容易混淆。批“一个文革”，抓住它的两个要害，一是认为民众智力低下，二是混淆党的运动与民众运动的本质区别。社会运动理论不研究党的运动，因为它们与权力很近，属于政治学范围。■

2. 余汝信纠小鹰文中的张霖之之误

贵刊今年2月15日第213期小鹰《文革问答三》一文，引用的有关张霖之材料不确，理由简述如下：

1. 毛泽东在社教运动期间只点过国务院一位部长的名，此人即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根据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材料公布的当日会议记录，毛如是说：“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抄注：杜甫原句为：“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刘××：重点是党）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和讲话·1964年12月20日上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在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121。）

以上讲话大致内容，可见官方编纂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453（不过，年谱已将王鹤寿的名字隐去）。又可见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70-1371。该书说毛“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亦未指名这位部长就是王鹤寿。

2. 毛泽东在社教运动期间从未点过张霖之的名，更未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王鹤寿在毛点名大半年前已被免去部长职务，下放到辽宁鞍山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而张霖之在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仍再次被任命为煤炭工业部部长，同年7月任新成立的煤炭工业部党委书记。1966年8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于同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三次参加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可为旁证。

3. 文革中并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关毛说张是走资派的材料和传说。戚本禹与穆欣 1966 年 12 月 24 日到北京矿业学院讲话，戚只是说张是彭真的死党，毛批评煤炭部做官当老爷，还不如改成煤炭科算了。戚当日根本就没有拿什么毛的“张霖之就是”这句“金口玉言”到矿院“煽风点火”，因为毛根本就没有说过这句话（戚的讲话记录，可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 1966 年 12 月 26 日创刊号，又可见联合编辑部 1967 年 3 月编辑的《首长讲话选编（1966 年 11 月至 12 月）》）。

4. 所谓毛说“张霖之就是”这句话，源自于 1996 年 11 月 20 日《南方周末》发表的该报记者高晓岩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一文。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说法。此说后来又出现在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一书所载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一文中。“流言”散布甚广。笔者往好的方面推测，高文出现这样的错误，或许是出自于原始材料提供者（刘、何）的误记——将张霖之与王鹤寿混为一谈了。往不好方面说，就是涉嫌编造。而无论什么原因所造成，这样的张冠李戴，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有关所谓毛说过“张霖之就是”这一毫无事实依据的传言，实有隆重纠正之必要。

以上所说大意，笔者两年前的《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一文（载电子刊物《昨天》2016 年 8 月 30 日第 75 期）已论述过一次，现重述一遍。■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